

红旗

一九七四年 12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七四年第十二期 目 录

思 想 评 论

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池 恒 (3)

继续抓好学习和批判.....吕 真 (8)

加强革命团结 争取更大胜利.....郑 实 (12)

认真看书学习 抓紧批林批孔

集中优势兵力 各个歼灭敌人.....昆 骏 (15)

儒家是杀人如麻的刽子手.....吴 畅 (20)

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
.....魏 理 (26)

论法家与“清官”的根本区别
.....天津铁路分局天津站工人理论小组 (33)

正义战争必然胜利
——批判《盐铁论》中儒家的军事投降主义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三八九舰理论小组 (38)



支持新生事物 发展大好形势

在银幕上为无产阶级争光

——影片《闪闪的红星》的一些创作体会

.....八一电影制片厂《闪闪的红星》创作组、摄制组 (43)

小厂也能造出四百吨大平板车

.....河北沧州市交通局四〇〇小组 (52)

在两条道路斗争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大队党支部 (57)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好得很

.....中国共产党辉县委员会 (62)

注意总结实践经验 办好社会主义农业

争取社会主义农业的更大发展赵丰年 (67)

总结抗旱经验 促进农业发展贺建农 (72)

学大寨就要抓路线宁江 (78)

科 学 史 研 究

对人体认识的两种世界观斗争金卫 (84)

☆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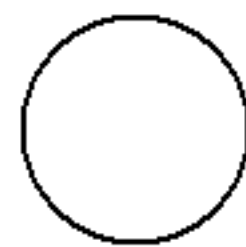


毛主席语录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
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
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
校。**

**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
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
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



毛主席语录

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经过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实现的。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

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思想评论

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池 恒

现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正在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紧密地团结起来，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夺取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更大胜利，以发展当前的大好形势。在这种情况下，支持和扶植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促使其发展壮大，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涌现出或进一步发展了大批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例如，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革命委员会的诞生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加强，革命样板戏的创作与普及，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壮大，工农兵上大学和教育的改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医务人员到农村去，农村的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亿万群众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各级领导班子的老、中、青三结合，培养工农兵干部的学习班，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参加劳动，以及农业、工业、商业、文教方面的许多先进单位和科学技术方面的许多发明创造，等等，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成果，是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重要标志。它们的出现，说明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各条战线，社会主义革命正在深入，社会主义建设正在前进，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它们代表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方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途。



毛主席说：“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就是社会主义的革命的**新生事物不断战胜资本主义的腐朽的旧事物的历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前进，同新生事物的出现及其发展壮大，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这样，我们共产党人对于革命的新生事物总是抱着满腔热情的态度，并把支持和扶植新生事物的发展作为自己的重要的革命任务。毛主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对于新生事物的支持，为我们作出了榜样。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毛主席曾热烈地赞扬了河北省三户贫农的社会主义革命精神，指出：“这三户贫农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一切个体经营的农民，终归是要走这三户贫农所坚决地选择了的道路的。”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科学的预言。在各个时期的各条战线上，毛主席都发现和支持一批代表新生事物的典型，为广大革命群众指出了具体的奋斗目标和政策界限。今天，我们注意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所涌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使它们迅速发展壮大，就可以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使社会主义事业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这是发展当前大好形势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事业，就是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后消灭任何剥削制度和任何阶级，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极其光荣而伟大的事业，它尽管会遇到许多艰难和曲折，革命的群众运动总是朝着这个基本方向前进，而且每前进一步都要以不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为先导。毛主席说：“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这些新的东西，有利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而不利于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派。它们的出现及其发展壮大，意味着资产阶级力量的削弱，无产阶级力量的加强，是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胜利。因此，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这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发展社会主义而反对资本主义，也就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我们在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进行的伟大斗争中，要经历若干发



展阶段，我们必须注意发现和积极扶植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代表着历史前进方向的新生事物，在破坏旧的东西的同时，“在旧的残余还没有清除干净的地面上，小心地照顾从碎片底下生长出来的新事物的幼芽”，让它们尽快地成长，占领各个方面的阵地。

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出现的，它们的发展壮大同样需要经过斗争。毛主席说：“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从这种幻想出发，而要从实际出发。历史总是螺旋式发展的，不是直线式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新事物刚刚诞生的一段时间内，旧事物总是比新事物强些。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只有经过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得到锻炼和发展。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基本路线指出，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资产阶级为了复辟旧制度，必然要千方百计地扼杀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在我们革命队伍内部，有些人受习惯势力的影响，也会有意无意地压抑它们。有的时候，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要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必须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积极地进行政治和思想方面的斗争。对于阶级敌人攻击、破坏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反革命言论和行动，要发动群众进行彻底的揭露和批判，决不能容许他们兴风作浪。在我们革命队伍内部，则要广泛深入地进行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使各条战线上的同志都自觉地用党的基本路线指导自己的工作，辨别正确和错误，识别先进和后进，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并从儒法两条路线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在它们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新的问题，这是必然的，不然没有矛盾怎么发展呢？我们对这些新的问题要积极慎重地加以解决，不能轻率处理，更不能因为有了问题就把新生事物否定了。新生事物有缺点，有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积极地满腔热情地帮助它肯定成绩，克服缺点，解决问题，总结经验，使之更好地成长。应该看到，当前的大好形势为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成长提供了条件，但不等于在发展新生事物的问题



上就不存在斗争了，新生事物就可以自然而然地成长起来了，相反，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如果对新生事物不闻不问，任其自流，那是错误的，有害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最根本的还是靠正确的路线。新生事物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产物，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发展新生事物的根本保证。历史经验证明，凡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得到贯彻执行的时候，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就蓬蓬勃勃地发展；凡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受到干扰和破坏的时候，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就受到压抑和摧残。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曾经出现一大批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后来由于刘少奇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它们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有一些竟然被砍掉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更好地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就迅速成长。但是，由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反对和破坏，某些地方也一度出现了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潮，致使有些新生事物的发展又受到了影响。在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清算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批判了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提高了路线觉悟，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又得到迅猛发展。“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对待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这个问题上，决不能忘记两条路线的斗争，要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办事。

批林批孔运动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这场斗争所要解决的，从根本上来说，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问题。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拚命地反对社会主义的新事物，是新事物发展壮大的严重障碍。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深刻批判那种坚持倒退，反对革命，妄图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思想，就可以为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发展开辟道路。例如，毛主席一再倡导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但是，我们在实行这个制度的过程中，为什么往往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一些阻力呢？主要的就是因为有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劳心者



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样一些陈腐的观念在起作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了孔孟之道，广大干部参加劳动这个革命的新生事物得到了更好的发展。最近，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不断深入，在各级领导干部的带动下，干部参加劳动更出现了新的气象。这就充分说明，要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必须深入批判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牢固地树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把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进行到底。

就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本身来说，要使之发展壮大，主要包含着两个方面：一个是如何使它逐步提高和逐步完善；一个是进一步普及的问题。这两个方面，又互相联系着。任何新生事物都不能总是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它要在斗争中不断地发展完善，而且只有不断地发展完善，才能充分显示其不同于旧事物的优越性，从而更加有利于推广；一经推广开来，达到了普及，实践的经验更多了，它就会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从而更快地完善起来。这里，关键就在于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当前我们国家正在生长着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一般都有几年的历史了，它们不论是在自身的发展中还是在普及的过程中，都已经积累了许多好的经验。有些新生事物则是以前就有，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得到了迅速发展提高，它们的历史更长，经验更丰富。即使是象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这样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蓬勃发展起来的新生事物，虽然时间不很长，但是由于发展很迅速，很普遍，也有了不少的先进经验。对于这些经验，都应该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认真地加以总结，积极地予以推广。哪怕是初步的经验，也应该给以足够的重视。这是满腔热情地对待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一个重要表现。我们切实地把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这项工作抓紧抓好，就可以促使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迅速发展壮大。

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更加团结，无产阶级专政越来越巩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深入人心，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再加上我们已经取得了在各条战线上进行斗批改的丰富经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迅速发展不仅具备了可能性，而且是具备了必然性。我们要跟上这个形势，为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而努力工作。



继续抓好学习和批判

吕 真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发动和引导广大群众、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以夺取各项战斗任务的胜利。多年的实践表明，认真抓好学习和批判，这对于进行反修防修的斗争，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都产生了和正在产生着重大的作用。现在，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全国各族人民革命团结大大加强，各条战线的革命和建设蓬勃发展。为了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把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坚持下去，我们要很好地总结和运用抓好学习和批判的经验，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学习和批判上来，进一步搞好批林批孔。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群众性的学习运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许多同志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重要性的认识，比过去深刻得多了。但是，由于认识和理解的程度不同，在学习的自觉性和坚韧性方面，就会有不少差别。比如，有的同志总是把学习看作可紧可缓、可多可少的事情；有的同志则满足于一知半解，不愿意下苦功夫，遇到困难，就产生畏难情绪；也有同志认为，批林批孔搞得差不多了，学习和批判可以松松劲了，或者可以放在次要的地位，不必那么用力去抓了。诸如此类的想法，都阻碍着我们进一步搞好学习和批判。

学习问题，是全局性的问题，是同党的路线，同党的建设，同革命的成败联系在一起。对于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来说，学习问题，也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斗争中，只有借助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才能够使我们变得聪明起来，才能够使我们比较善于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比较正确地分析和解决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所遇到的各种矛盾，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做好革命工作。正如列宁



所说：“要理智地、自觉地、有效地投身于革命，就必须学习。”

正因为学习问题对全党是这么重要，所以，毛主席在各个革命时期，总是反复教育我们，“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要“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毛主席的这些教导，都是党内历次路线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的科学总结。我们要重视和深刻体会这些历史经验，把学习问题提到“**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的高度，提到党性的高度来认识，克服那种不认真学习、不坚持学习的错误倾向，把学习作为我们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来抓紧抓好。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就要紧紧地把握这个本质特征，把学习和批判结合起来，继续搞好批林批孔。学习和批判是辩证的统一。“**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认真搞好大批判，通过对香花和毒草、正确和错误的比较、鉴别，就有助于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真正学到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只有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掌握锐利的思想武器，才能真正搞好大批判，把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批深批透。

革命的大批判，是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有力武器，是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和改造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重要方法。我们要自觉地运用这个武器，来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毛主席曾经多次尖锐批评了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但却丧失了批判能力，甚至向反动思想投降的共产党员，批评了那些口称相信马克思主义，却不重视批判资产阶级的人。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渗透在各个领域，需要我们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运用革命的批判的武器，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批判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批判资本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倾向，来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在各个领域的胜利。可以说，是不是敢于和善于使用批判的武器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进行斗争，是衡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马克思主义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批林批孔运动，促进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给我们提供了学习马克思主义、锻炼批判能力的极好条件，对提高广大群众、干部的路线斗争觉悟和政治思想水平，有很大好处。我们一定要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任何松劲情绪都是错误的。

在进一步开展学习和批判中，要强调注意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



点和办法。就是说,学习马克思主义,我们不仅要了解革命导师对各种问题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要学习革命导师观察和解决各种问题的立场和办法,使我们能够逐步做到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去正确地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所提出的各种问题。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许多问题,能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是对我们学习得好不好的一个检验,也是我们犯不犯错误的一个界限。例如,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空前团结,这种团结,是我们夺取新的胜利的基本保证。我们要十分珍惜这个革命团结,还要用更大的努力去发展这个革命团结。但是,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国际上还有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捣乱,因此我们又应当经常警惕阶级敌人搞分裂搞破坏搞颠覆的阴谋。对阶级敌人破坏革命团结的行径,要及时揭露、坚决斗争。在我们人民内部,如果有违背社会主义原则、不利于革命团结的言行,也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进行耐心的批评、帮助,加强在革命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如果一讲团结,就忘了斗争,或一讲斗争,就忘了团结,这都会犯错误,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又例如,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生产的问题,是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所以,我们要高度重视和积极推动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但是,我们决不能忘记“**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只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好革命,抓好阶级斗争,才能促进生产。搞好批林批孔,提高了人们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发挥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因而有力地推动了生产,这是抓革命促生产的结果。最近,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同志带领广大干部,纷纷奔赴各条战线,同群众一起,参加生产劳动,调查研究问题,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生产的发展。这也是抓革命促生产在一个方面的生动体现。毛主席曾指出:“**在订计划的时候,必须发动群众,注意留有充分的余地。**”发动群众和留有余地,这也是对立的统一,必须在实际工作中恰当地加以掌握。总之,这类实际工作中的问题,需要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经常分析具体情况,力求解决得比较正确。

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际上也就是改造我们的世界观,改造我们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如果不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不克服自己头脑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就不可能真正学习和



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不可能真正改造客观世界。毛主席提出的“要斗私，批修”，是我们应当经常牢记的纲领。在继续深入开展的学习和批判中，我们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高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我们要很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剖自己的思想、世界观，对于一切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不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思想作风，都要自觉地加以纠正。这样，我们就能随着革命的发展而不断前进。

继续抓好学习和批判，是各级党组织的重要任务。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同志，一定要把主要注意力放到学习和批判上来，走在运动的前头。既要做好学习和批判的领导工作，又要带头学习，带头批判，把学习和批判不断引向深入。要正确处理学习和工作的关系。要认真办好各种形式的读书班。除了读书班这种形式外，更大量的还是要靠在工作岗位上坚持学习。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应该是多数干部和群众的主要办法。只要真正从思想认识上解决了问题，又按照各地区、各部门的实际情况，作出适当的安排，那么，学习和批判就一定可以更好地开展起来，就一定能够坚持下去。

为了抓好学习和批判，我们要继续加强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充分发挥理论队伍的骨干作用。各级领导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支持这一新生事物，帮助他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他们密切联系群众，密切联系实际，在斗争中学习、提高，改造世界观。我们的理论队伍应当是无产阶级坚强的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军队，除了研究中国问题之外，还要积极关心和研究国际问题，特别是两霸的争夺和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危机问题。这对于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都是有帮助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所开创出来的大好形势，为进一步深入开展学习和批判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群众、干部，积累了搞好学习和批判的丰富经验，例如：党委加强学习和批判的思想、组织领导的经验，搞好党委中心学习组的经验，学习和批判密切联系实际、为现实斗争服务的经验，建立和巩固理论队伍的经验，办好政治夜校的经验，等等。这些经验，对于进一步搞好学习和批判，是很有好处的。我们要很好地总结和运用这些经验。各级领导同志要深入实际，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及时发现、推广在学习和批判中出现的先进经验，解决在学习和批判中出现的新问题。我们深信，随着广大群众、干部学习和批判广泛、深入的开展，必然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高潮的到来。



加强革命团结 争取更大胜利

郑 实

在批林批孔运动推动下，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正在继续深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更加深入人心。抓革命、促生产的群众运动正在蓬勃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进一步茁壮成长。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精神面貌更加振奋。最近干部参加劳动的热潮，就是这种革命的精神面貌在一个方面的表现。全国无论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条战线，都呈现一片生气勃勃的景象。

在当前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应当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抓好批林批孔，进一步加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革命团结，以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主席指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的，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结果。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得到贯彻，革命就胜利，就前进；什么时候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受到干扰，革命就遭受挫折。毛主席提出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为我们正确解决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问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这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的。

有了一条正确的路线，还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这条路线而奋斗。路线指导团结。有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有了团结的基础和共同努力的目



标，实现革命的大团结才有可能。团结实现路线。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团结起来，肩负着领导革命重任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工人阶级同自己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团结起来，全国各族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才能产生压倒一切敌人、战胜一切困难的强大的物质力量，才能完成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把各条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历史任务。革命团结搞得不好，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落实得好；相反，团结涣散，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革命事业就会受损失。这同样是我们应当永远牢记的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党粉碎了以刘少奇为头子和以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些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一贯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他们在国内只代表一小撮被打倒了的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在国际只代表帝、修、反，特别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利益，因而他们是极端孤立的，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代表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因而它能够动员亿万人民去同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胜利，又在新的基础上更加广泛地团结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为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创造了条件。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我们需要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的巨大胜利。毛主席指出：“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首先是要保证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证在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全国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手里”（《中国共产党章程》）。当前，批林批孔运动正在蓬勃发展。我们要使这场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要在批林批孔的带动下，继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要继续加强战备，警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阴



谋。这些都要求我们进一步搞好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的团结。这是革命的大局。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 and 创造性，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只要我们这样做，就一定能够进一步“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为了加强革命的团结，必须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反党集团只是一小撮，干部的绝大部分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根据毛主席历来的教导，我们对于少数犯了或多或少错误的同志，采取了“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这些同志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并为他们创造种种必要的条件，使他们有改正错误的机会，这种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成效，促进了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严于解剖自己，作认真的自我批评，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焕发精神，努力工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改正错误，这种态度也受到了群众的欢迎。我们党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实践反复证明，只有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才能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坚持这样做，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会更加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会更加兴旺，而国内外阶级敌人的一切阴谋都将继续遭到破产。

毛主席号召我们：“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证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是好的，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国家机关是好的，是经得起风浪的。国内外阶级敌人多次妄图分裂我们的党，分裂我们的国家，都没有得逞。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始终不懈地坚持团结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就一定能够保证我们国家沿着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胜利前进。



认真看书学习 抓紧批林批孔

集中优势兵力 各个歼灭敌人

昆 骏

中国革命战争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强大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应当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就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透彻地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方针、战术原则和作战方法。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是毛主席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军战略战术原则的核心，也是我们从事革命和建设工作应该掌握的科学的思想和工作方法。

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同样也将有它自己的表现，并将创造出自己特殊的、新的作战方法。”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正是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创造出来的人民军队特殊的、新的作战方法。它正确地反映了战争的一般规律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在战略战术原则上的生动体现。

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是物质的运动。战争的胜败，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等条件，同时，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我们不能超越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但是，能够而且应当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充分发挥主观指导的能动性，去争取战争的胜利。在战争中，作战双方为了夺取胜利，都力争主动。不过，这种“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这里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集中优势兵力，是达到歼灭敌人争取主动的主要的物质条件。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中国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对于一切内外反动派的进攻，我们完全有把握、有信心



打败他们。但是，敌强我弱，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只有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认真对待敌人，讲究斗争艺术，集中全力作战，方能取得胜利。这就要求不论在战役的部署方面，还是在战术的部署方面，都必须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用几个师对付敌人一个师，用几万人对付敌人一万人，用几路兵力对付敌人的一路，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这样，就把战争的胜利建立在坚实可靠的物质基础上。

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着事物的运动和变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是对立统一规律在革命战争指导上的具体运用。它告诉我们如何运用事物是无限可分的这一唯物辩证法的原理去认识敌人，对付敌人，如何正确看待敌强我弱的形势并实现其转化，如何按照量变质变的规律，去从根本上改变敌我态势，夺取战争的胜利。

毛主席指出：“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万事万物无不存在着矛盾，没有一个事物是不可以分割的。大和小，是对立的统一。一个大的事物可以分割成许多小的部分，而小的还可以分割为更小。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敌人，虽然是拥有雄厚军力的反动派，有全世界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是武装到牙齿的庞然大物。但它的庞大是由一个个小的部分组成的，也是可以分割的。蒋介石曾经拥有几百万军队，其势汹汹，不可一世，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我们同样可以把它分割为许多小的部分，予以各个歼灭。我们懂得用分割的观点去看待敌人，就能够采取分而歼之的办法对付敌人。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田只能一块一块地犁，就是吃饭也是如此。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能够吃下去。但是具体地吃，却是一口一口地吃的，你不可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叫做各个解决，军事书上叫做各个击破。”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把全部敌人都消灭，但却可以在集中优势兵力的基础上，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把敌人一口一口地吃掉。

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一样，战争中的双方也都具有两重性。敌人有强的一面，也有弱的一面；我们有弱的一面，也有强的一面。敌人是走向没落中的强，是要转化为弱的；我们是走向发展壮大中的弱，是要转化为强的。但



是，敌强我弱的形势，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各自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个条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正确。我们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决不是凭借“弱”来取胜，而是依靠自己的主观努力，实现力量对比的转化，使自己变为强者。“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他抛入劣势和被动”。善于集中兵力，一个一个地拣弱的打，在每一个局部上，每一个战役或战斗上，保证我同敌兵力对比的绝对或相对的优势，这样就可以使全局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在局部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使我军全局上的弱者的地位，改变为局部上强者的地位。以我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对付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就能够保证每一个局部上战役或战斗的胜利。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我们正是运用对立统一的规律去正确认识敌强我弱的形势，并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法去改变这种形势，使敌从全局上的强变为局部上的弱，我从全局上的弱变为局部上的强，从而实现全局上的强弱关系的转化。

事物的矛盾运动有一个从量变到部分质变再到完全质变的过程。由于量的变化积累起来，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不可避免地引起质的变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体现了在革命战争中，敌我双方力量对比从量的积累转化为质的飞跃这一辩证发展过程。毛主席指出：“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开始，我军的力量是弱小的，在战略上处于暂时的劣势和被动的地位。但是，我们正确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在战役或战斗上尽可能实行歼灭战，使敌人被歼一团少一团，被歼一师少一师，促进敌我力量的消长发生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发展变化。集合许多大小的歼灭战，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形势，使我们的力量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地位；敌人的力量由大变小，逐步地被歼灭。由于执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促进了敌我力量对比由量变到质变，由局部质变到全部质变的发展，这对于指导整个的战局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解放战争中，毛主席紧紧抓住改变敌我有生力量对比这一关键，对每一个阶段我军歼敌的任务作了一系列明确的指示，推动了全国战局的发展，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解放战争的头八个月，我军就歼敌七十一万人，迫使敌人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我军开始在一些地区转入战略性的反攻。经过一年作战，共歼敌一百一十二万人，毛主席根据新的力量对比，提出了举行全国性反攻的任务，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



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解放战争的第三年，由于敌军从战争初期的四百三十万人减至二百九十万人左右，我军由一百二十万人增至三百余万人，转变了我军在数量上长期居于劣势的状况，这是中国解放战争中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在这样的形势下，毛主席提出了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的方针。经过毛主席亲自决策和指挥的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就使蒋介石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上被消灭。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上的，是人民军队的作战原则。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只有无产阶级的军队才能掌握和运用，也只有在人民战争中，才能发挥出它的巨大威力。敌人虽然熟知我们这一作战方法，但是，由于他们的世界观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其战争的性质是反人民的，决定了他们根本不能理解和实行这一战法。他们无论怎样努力，都不能阻止我们的胜利，也不能挽救其失败的命运。

“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这归根到底是个思想政治路线的问题。毛主席制定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来源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不要坚持这个作战原则，说到底，是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问题。**“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是一些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唯心主义者。他们从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出发，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竭力推行一条机会主义路线，在作战指导思想，百般反对毛主席的作战原则。他们或者根本上否认敌强我弱的客观实际，轻敌盲动，四面出击，用“两个拳头打人”；或者把敌人看成铁板一块，畏敌如虎，不敢进攻。其共同点都是孤立地、片面地、凝固地看问题，是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者。叛徒、卖国贼林彪，一贯坚持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大搞军事平均主义，反对毛主席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正确方针。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就竭力鼓吹不能集中作战，只能分兵防御，搞什么“短促突击”。在解放战争中和全国胜利以后，又公开兜售其主观臆造的所谓“六个战术原则”，对抗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用什么“一点两面战术”，反对集中兵力，四面包围，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林彪的所谓战术原则，是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大杂烩，是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的典型。



在打仗的问题上，我们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做其它工作也应该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比起打仗来，就另一种意义来说，要更深刻、更复杂、更艰巨。我们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摆在我们面前有许多工作要做，有许多困难要克服，有许多问题要解决。这些工作、困难和问题虽然很多，我们也应该象打仗一样，抓住主要矛盾，选好主攻方向，正确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要抓好典型，突破一点，推动全局，“面上的工作要先抓好三分之一”。要紧紧抓住那些最需要、最薄弱、但影响很大的重点，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解决问题，以达到“一能全歼；二能速决”的目的。如果分散力量，齐头并进，其结果将是“处处攻击，处处不得力，拖延时间，难于奏效”。许多年来，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执行毛主席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已经收到了很大的成效。许多巨大的建设工程，许多具有先进水平的产品，正是依靠广大群众，集中力量，各方支援，采取会战、协作的方法建成或制造出来的。深入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对于加速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夺取**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胜利，有着重要的意义。

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必须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是贯彻执行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原则的根本保证。不集中，不协调，不统一，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就必然成为一句空话。要自觉地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才能在各项工作中，实行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原则，才能步调一致地推进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更大发展。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是毛主席军事路线战胜王明、林彪一伙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结果。在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深入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提高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觉悟，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胜利前进！



儒家是杀人如麻的刽子手

吴 畅

儒家本来就是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他们残酷地杀害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的事实，真是罄竹难书。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揭露过儒家的仁义道德就是两个字：吃人。可是，历代反动派却无耻地吹捧儒家“为政以德”，（《论语·为政》）“不嗜杀人”，（《孟子·梁惠王上》）恶毒攻击法家“杀人盈野”，（《孟子·离娄上》）“乐以刑杀为威”。（《史记·秦始皇本纪》）叛徒、卖国贼林彪也操着同一个腔调，攻击法家是“罚家”，“焚书坑儒”，杀人多。这完全是对历史的肆意歪曲。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还儒家以刽子手的本来面目，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儒家以及林彪尊儒反法的反动本质，有助于深入进行批林批孔，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也是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之一。

毛主席指出：“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儒家作为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对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采取的就是这样的原则。春秋末期，在以儒法两家为代表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一开始，就暴露了儒家为了维护反动的奴隶制度而凶残杀人的狰狞面目。儒家的祖师爷孔老二，标榜自己爱人而不杀人，恰恰是他代行鲁国宰相不到三个月，就杀害了法家的先驱者少正卯，并暴尸三天，用罪恶的屠刀挑开了儒法斗争的序幕，为其后一系列的残害法家事件开创了先例。到了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在向奴隶主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更加激烈；而儒家及其所代表的奴隶主贵族势力，一旦复辟上台，他们对人民和法家的屠杀就更加疯狂，反革命的报复就更加残暴。这个时期法家的著名代表人物，大都惨遭儒家的毒手。吴起在楚国，“明法审令”，实行“法治”，就被发动武装叛乱的奴隶主贵族用乱箭射死。商鞅在秦国进行变法，那些被撵下台的儒家之徒，长期“杜门不出”，却暗



中窥测方向，以求一逞，秦孝公刚死，他们就破门而出，发动反革命政变，车裂商鞅，并杀害了商鞅全家。骨子里崇奉儒家的赵高，在阴谋篡夺了秦王朝的政权后，迅速地改变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对革命人民和法家进行血腥的报复，李斯惨遭腰斩，并被“夷三族”，大将蒙恬、蒙毅被杀害，将军冯劫被逼死，秦始皇时代的法家人物几乎都死于他的屠刀之下。以儒家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反动势力，就是妄图用这样的一套反革命大屠杀来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

儒家的杀人事业尽管每天都在做，但是，这班屠夫却满口仁义道德。他们杀了法家，还制造一些借口，证明他们杀得有“理”。孔老二强加给少正卯的五条“罪状”，即所谓“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荀子·宥坐》）就是为残杀革新派人士而制造的莫须有的罪名。毛主席说：“**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一个整社的好经验》一文按语）少正卯被孔老二所加在头上的几条“罪状”，实质上就是这位法家的先驱者面临着春秋末年的社会大变动，主张变法革新，宣传封建制度的优越，揭露奴隶制的罪恶，为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大喊大叫。这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可是，孔老二把少正卯的革命宣传和主张，视若洪水猛兽，叫嚷：“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这充分表现了这位儒家“圣人”的恶霸行为和法西斯主义作风。他杀了自己的政敌少正卯，但又不敢把这宗血案公之于世，还是法家的杰出代表荀子才最早地把它揭露出来。后来儒家诛异己、杀政敌，有的就援引孔老二所谓少正卯的“五大罪状”作为他们的依据。北宋时期吕诲之流反对王安石变法，就是这样干的。后来有人甚至叫嚷如果王安石落在孔老二的手里，“必膺少正卯之诛”。可见，孔老二杀的不只是一个少正卯的问题，而是“自孔氏演此丑剧，于是后世虽无孔氏，而所诛之少正卯遍天下”。（《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

封建制度建立后，地主阶级逐步地从革命转化为反动。曾经是反动没落奴隶主阶级代表的儒家，也就变成了封建社会中最黑暗、最反动的政治势力的代表。他们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依据孔老二当年在支持郑国奴隶主贵族血腥镇压奴隶起义时，立下的所谓民“慢则纠之以猛”（《左传》昭公二十年）的那一套办法，来屠杀敢于反抗地主阶级统治的农民。毛主席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开历史倒车的儒家看来，农民起来造地主阶级的反，叫做“犯



上作乱”，叫做“盗贼藏奸”，该列入杀无赦的“九刑”。这样，儒家又成了残杀农民和其他革命人民最凶狠的“屠伯”和“苍鹰”。东汉末年，被吹捧为“海内大儒”的卢植，就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和另一个“好诗书”的孔孟之徒皇甫嵩，疯狂地镇压黄巾起义。前后半年，直接死在他们屠刀之下的农民，有明确记载的就达几十万。连已经病死的农民起义领袖张角，他们也不放过，实行“剖棺戮尸”。（《后汉书·皇甫嵩传》）一次，他们还把被他们屠杀掉的十万农民的尸体垒成小山，以示威风，真是残忍到了极点。这充分暴露出象卢植这样的一贯伪装成对于“女倡歌舞”，“积年，未尝转眄”（《后汉书·卢植传》）的正人君子，却是嗜血成性的吃人魔鬼。

随着封建统治日益走向腐朽没落，儒家杀人就更加狠毒。这从南宋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和明朝的王守仁屠杀农民的事实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朱熹这个自称继承儒家道统，在孔孟之道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大儒，就竭力鼓吹对人民“当杀则杀之”，扬言“我只有寸铁，便可杀人”！（《朱子语类辑略》）他在做地方官时，竟抢在新皇帝即位、实行“大赦”之前，拉出“囚徒”十八人，立即杀掉。他还以所谓“谕以某日，不俘以来，将斩汝”，胁迫他的部将田升残酷地镇压潭州瑶民起义。可见这个言必称“诚”、“敬”，口不离“中和”的大儒，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屠杀人民的机会。王守仁曾经假惺惺地说过：“无故杀一鸡犬，尚且不忍”。（《告谕渊头剿贼》）但当他挥着屠刀残杀起义农民时，却毫不心慈手软。他镇压江西、福建的农民起义，所过之处，“曾无完土，荒村僻坞，不遗片瓦尺椽”；（《地方紧急用人疏》）不到两年，被他屠杀的农民有一万八千多人，被他纵火烧死的更是不计其数。同时，他还向最高的封建统治者邀功取宠，自鸣得意地说：“贼无出路，烧死数多，天明看视，止存骸骨，头面烧毁莫辨，以此难取首级。”（《南赣擒斩功次疏》）他镇压广西八寨、断藤峡瑶民起义，一次入山搜杀了男女老幼四千多人，致使“远近岩洞之中，林木之下，堆迭死者”，“臭恶熏蒸，不可复前”。（《八寨断藤峡捷音疏》）就是这样一个极端残忍的家伙，竟然口中还念念有词，讲什么“民吾同胞，尔等皆吾赤子，吾终不能抚恤尔等，而至于杀尔，痛哉痛哉，兴言至此，不觉泪下”。（《告谕渊头剿贼》）这活灵活现地自我勾画出儒家一边吃人、一边流泪的鳄鱼本相。

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由于这个时期地主买办阶级的反动统治极端虚弱，仅靠他们本身的力量已经无法对付蓬勃发展的人民革命的力量，这



就决定了他们必然要投靠帝国主义。而反动统治者历来崇奉的孔孟之道，就是卖国之道。尊孔必然卖国，卖国必然尊孔，二者是相互联系的。因此，近代中国，地主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曾国藩、袁世凯、蒋介石，大搞尊孔，不仅带有封建性，而且带有买办性。他们崇洋卖国，勾结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这正是他们作为近代儒家区别于以往儒家杀人的一个特点。“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的曾国藩，从孔老二的“忠信笃敬”中，引出了一套对帝国主义要做到所谓“以德报怨”的卖国主义理论，无耻地把帝国主义的侵略说成是“有德于我”。（《日记·治道》）按照这条卖国主义路线，曾国藩实行“借洋兵以助剿”（《议复借洋兵剿贼片》）的方针，从他的外国主子那里，请来洋兵，运来洋枪洋炮，血腥地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据估计，太平天国革命期间，被反动派屠杀的人民约有二千五百万。明令以孔孟之道为“国纪”的袁世凯，不惜向日本帝国主义拍卖整个中国的主权，换取帝国主义支持他大杀革命者和坚持爱国的人民。当时袁世凯杀人的恐怖情景，正如鲁迅所描写的：“于是杀，杀，杀。北京城里，连饭店客栈中，都满布了侦探；还有‘军政执法处’，只见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进去，却从不见他们活着走出来”。（《杀错了人》异议）继袁世凯之后，登上中国现代历史舞台的独夫民贼蒋介石，更是一个“满身鲜血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将革命进行到底》）他叫嚷以“曾文正公”为榜样，嘴上喊叫着“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手里却抡着大刀向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头上砍去。他的口号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仅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两三年间，他就屠杀了一百多万革命者。在他统治时期，被他屠杀的人民是无法用数字表示的。这个家伙，还学着孔老二、曾国藩等人的腔调，咒骂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为“匪”，把他的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血腥行为叫做“行仁”，这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儒家的“仁”是一种什么货色了。

应当指出，儒家不仅拿着钢刀子杀人，而且还用软刀子杀人。儒家的纲常名教，程朱理学，就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这两把杀人的刀子，相互补充，各有妙用。按孔老二的说法，“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就是既要发挥刽子手的职能，又要发挥牧师的职能，以维持反动阶级的统治。朱熹则鼓吹“明天理，灭人欲”，要从精神上扼杀被压迫阶级的一切革命思想，使他们变成任压迫阶级驱使的会说话的工具。王守仁说得更露骨：“杀人须就咽喉上着刀，吾人为学，当从



心髓入微处用力”。(《与黄宗贤》)可见他们的“为学”，无非是研究杀人之道。历代封建法律明文规定：有乖纲常、干犯名教者，杀！凡所谓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都被定为杀无赦的“十恶”。特别是广大劳动妇女，受封建纲常名教的迫害最深。按照儒家的“三从”、“四德”，她们要从一而终，如果一旦死了丈夫，就只有一死：再嫁则“失节”，“守节”则饿死。清代著名的进步思想家戴震揭露说：“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卷上)儒家以纲常名教之“理”杀人，是血案中不见血迹的杀人手段，其毒辣，其残酷，有时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两千多年来，死于儒家钢刀下的人民，固然不计其数，而死在儒家软刀子下的人民，又何止千千万万！

在历史上，法家也杀过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法家杀人要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在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时期，法家为了夺取和巩固政权，曾经镇压了一批复辟奴隶制的反革命分子，不杀不足以维护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这是进步的革命的措施，应该加以肯定。但是，他们对反革命的镇压是不彻底的，因为他们进行的革命“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为其结果的，他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作彻底镇压反革命的事情”。(《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按语)老奸巨猾的儒家后来搞复辟时，杀起人来比法家的镇压反革命厉害得多。在后来的封建社会里，有的法家镇压过农民起义，这是他们的污点，是他们的阶级局限性的表现。

在历史上，为什么儒家杀人总是比法家更厉害，更毒辣呢？这是有其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

儒家本来就是没落奴隶主贵族的代表。在奴隶社会里，“基本的事实是不把奴隶当人看待”。(列宁：《论国家》)奴隶主可以任意买卖、屠杀奴隶，可以拿奴隶当祭祀和殉葬的牺牲品。在儒家经典里，明文记载的就有墨、劓、剕、宫、大辟等五种酷刑，孔老二之流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说明这些酷刑都是用来对付奴隶的。奴隶主阶级的这种极端残忍的本性，就集中反映在儒家思想里。反动的剥削阶级都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当他们感到末日的来临，必然失去一切理智。他们总是按照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反动逻辑办事，妄图通过对于革命人民的反攻倒算与血腥屠杀，来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儒家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推行的守旧、倒退、复辟、投降的反动路线，正是这种没落阶级本性的表现。因此，儒家无论在哪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反动统治者的帮凶、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儒家在大部分时间居于掌权的地位，而法家



则处于被排斥、被压迫的地位。毛主席说：保护“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起来造反，儒家总是凭借他们手中掌握的国家机器，动用军队、法庭、监狱等作为镇压和屠杀起义农民的工具。儒家还利用他们在政治上取得的权势，“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反对党八股》）谁敢违反，谁就会被当作“乱臣贼子”而遭到他们的屠杀。正是由于儒家长期居于统治地位，他们就能够把孔孟的吃人之道同封建的反动政权结合起来，从肉体上、精神上屠杀人民。

叛徒、卖国贼林彪抛弃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歪曲历史事实，吹捧杀人如麻的儒家“以仁爱之心待人”，攻击法家杀人多，其罪恶目的是借以攻击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他咬牙切齿地咒骂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暴政”，什么“绞肉机”。这种恶毒的咒骂，是渊源于孔孟之道的“仁政”。对此，毛主席早已作了深刻的批判，明确指出：“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论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对于阶级敌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无产阶级的政策是：“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象我们对俘虏军官们已经做过的那样。”（《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种无产阶级政策，是儒家和一切反动派所决不可能有的。一切反动派从来就没有对人民施过仁政，相反，他们是靠杀人上台并维持其反动统治的。反动派杀人愈多，人民的反抗就愈烈，革命力量就愈大。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压在他们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总结自己用鲜血换来的经验，深深懂得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须臾离开的护身法宝。叛徒、卖国贼林彪尊儒反法，借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为了投靠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建立林家王朝的法西斯统治。“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林彪一伙只能遭到可耻的失败。我们一定要继续深入批林批孔，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对敌，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

魏 理

在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不但在政治路线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而且在军事路线上也存在尖锐的斗争，研究这种斗争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深入批林批孔，是有益处的。

—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毛主席指出：“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我们拥护正义的战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

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社会日趋腐朽没落，走向崩溃，阶级斗争十分尖锐激烈。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汹涌澎湃，猛烈地冲击着腐朽的奴隶制度。对待这种促进社会变革的暴力行动和革命战争，是反对还是拥护，各个阶级、各个政治集团必然要作出抉择，表明自己的态度。

以孔丘、孟轲为代表的儒家，是维护和复辟奴隶制度的顽固派。他们对奴隶造反、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惊恐万状，把当时正在兴起的进步的正义战争视为洪水猛兽，攻击奴隶起义、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是没有“仁义”，是“犯上作乱”。孟轲疯狂地叫嚷“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①，并恶毒攻击商鞅等法家代表人物，说什么要使“善战者服上刑”^②。

法家和儒家针锋相对，旗帜鲜明地公开主张要革新变法，就要采用暴力，就要用兵。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秦国变法的实践者商鞅主张耕战，并提出“以战去战”的著名论点，实际上就是主张用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战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况，针对孔孟之流的谬论，公开申明，“夺然后义，杀然后仁，上下易位然后贞（正）”^③。在这里，荀况虽然也讲到“义”、“仁”，但完全赋予了新的内容。他的用革命暴力消灭反革命暴力的主张，是新兴地主阶级起来夺取政权的号



召书，在当时起了很大作用。法家集大成者韩非也说：能够实行法治，对已有灭亡征兆的诸侯国君，采取急风暴雨般的暴力行动，就能推翻其统治，统一天下^④。新兴地主阶级的军事家都是法家或者倾向于法家的。吴起、孙武和孙臆不仅重视革命战争，而且总结作战经验，留下了《吴子》、《孙子兵法》和《孙臆兵法》等论兵的专著。孙臆在他的军事著作中，曾经提出了“举兵绳之”^⑤，即以战争解决问题的著名论点。

儒法两家对待战争的不同态度，是由他们当时所处的阶级地位决定的。法家代表新兴地主阶级上升时期的要求，他们所进行的战争是进步的，是得人心的，因此敢于公开提倡正义战争。当时，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矛盾已经激化，要确立和巩固封建的经济、政治制度，必须用战争来解决这些矛盾。正如毛主席深刻指出的：“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法家的主张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的。

与此相反，儒家维护的是腐朽没落的奴隶制度，他们所发动的战争是反动的，是把历史拉向倒退的，因此不敢公开申明他们的战争观点，而是用“仁义”这些虚伪的反动说教，来掩盖其反对进步战争、坚持反动战争的实质。他们口头上叫嚷“去兵”、“去食”，实际上疯狂镇压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的战争。“去兵”、“去食”是假，反对进步战争是真；“仁义”是假，坚持反革命战争是真，他们时刻都在妄图用反革命战争实现他们“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⑥的迷梦。孔丘口里哼着“焉用杀”，但当他听到郑国奴隶主头子派兵对萑苻耕奴起义进行残酷镇压的消息时，就手舞足蹈，口称“善哉”，为这类反革命战争叫好，并且总结了郑国统治者镇压奴隶起义的反革命经验，提出了“宽以济猛，猛以济宽”^⑦，即镇压和欺骗相结合的反革命策略。当齐国新兴地主阶级代表陈成子杀死了奴隶主头子齐简公，夺得了齐国政权，孔丘竟如丧考妣，立即斋戒沐浴，急忙朝见鲁哀公，要求出兵干涉，妄图扑灭新兴的革命势力。这充分暴露了他反对、破坏正义战争，策动、支持非正义战争的反动嘴脸。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世界上仍然存在着正义的和非正义的战争。现代修正主义者是反对正义战争、支持非正义战争的。苏修叛徒集团一面扩军备战，加紧同美帝争夺，并进行核讹诈，一面又大肆渲染战争的恐怖，实际上是为了争夺霸权，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叛徒、卖国贼林彪也学着苏修叛徒集团的腔调，散布战争恐怖，重复儒家“大军之后，累世不复”^⑧之类的无耻



调言。这说明林彪也是抹煞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竭力反对正义战争的。他的反动说教，完全是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效劳的。

儒家制造“去兵”、“去食”的舆论，并不是他们不重视军队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作用。恰恰相反，反动派历来看军队如生命，牢牢地把军队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孔丘不是鼓吹“征伐自天子出”吗？就是主张，军权只能归奴隶主阶级所独有，而不准其它阶级拥有。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也是这样。他为实现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一面恶毒攻击革命暴力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恃力者亡”，一面却躲在阴暗角落里，拚命抓军权。在臭名昭著的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中，更狂妄叫嚣，要全国武装力量服从他们“统率部的集中统一指挥”，谁反对就“严厉镇压”。但是，这只是林彪的痴心妄想！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领导和指挥的无产阶级军队。“**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广大指战员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作为自己的光荣职责。林彪这个大军阀，妄图“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只能落个一切不能指挥、一切不能调动的自取灭亡的可耻下场。

二

实行“以礼治军”，还是“以法治军”，这是儒法两家在军队建设问题上斗争的焦点。

儒家推行的是“以礼治军”的路线。所谓“礼”，就是周礼，就是奴隶制那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也就是奴隶制社会的统治秩序。孔丘要“克己复礼”，要拚命维护和复辟奴隶制，在他们看来，用“礼”那一套教育士兵是最合适不过了。所以，他们拚命宣扬“忠信以为甲冑，礼义以为干櫓”^⑨，用所谓仁义礼智信之类的鬼话作为治军的信条，借以欺骗士兵听从奴隶主的指挥，服服帖帖地为他们去效劳。孔丘说什么“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也”^⑩，就是说，军队以“礼”作为指导，就能打胜仗。孟轲也叫嚣：“仁者无敌”^⑪，甚至说，只要有了“仁”，“就是使用棍棒也能抗击秦国楚国的精锐部队”^⑫。总之，在他们看来，只要以“仁”、“礼”等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灌输于军队，就能“无敌”、“功成”。“仁”、“礼”简直成了挽救奴隶制灭亡的灵丹妙药。

法家对儒家的这种“以礼治军”的反动说教是反对的。商鞅曾经针锋相对地指出：“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⑬，他辛辣地讽刺“仁义”、“礼乐”等为“六虱”，



把儒术归为十害，说“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⑭。韩非也尖锐地指出：“浅薄于争守之事，而务以仁义自饰者，可亡也”^⑮。法家实行一条“以法治军”的路线，公开提出要“以法为教”^⑯、“缘法而治”^⑰。他们认为，要想使士兵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充分发挥作用，就必须用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主张和变法革新思想教育士兵。按照法治的原则治理军队，才能使士兵懂得为革新变法路线而战斗、而牺牲是光荣的。

“以法治军”，首先是把战争和新制度的建立联系起来。法家公开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战争目的告诉士兵，让士兵懂得，“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⑱。“农”就是发展农业生产，“战”就是进行用新兴的封建制度统一各国的战争。并且指出：“民无所游食，则必事农，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⑲。这也就是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走的道路。

其次，他们注意发挥“民”在战争中的作用。荀子认为“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⑳。意思就是说，用兵打仗的根本，在于统一人民。地主阶级是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但是，在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对奴隶主阶级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所以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还能够借助于人民的力量去作战。

再次，法家为了动员人民参战，鼓励士兵勇敢打仗，主张“按功而赏”^㉑、“法不阿贵”^㉒。按照军功的大小确定爵位，奴隶有军功也可免除奴隶身份；奴隶主贵族没有军功的人，不得有高贵的爵禄。这就有利于鼓励士兵为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而战。同时，对奴隶主贵族的等级制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由以上可以看出，法家“以法治军”的思想，就是把坚持变革、坚持前进的政治主张贯注于军队之中，以达到为其政治路线服务的目的。

儒法两家治军思想不同，用人的标准也不一样。儒家是没落阶级利益的代表，在选将用人上必然推行一条任人唯亲的路线。他们所选的人不是宗族贵戚，就是所谓“忠孝仁义”之徒。法家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在选将用人上主张“使法择人”^㉓、“称能而官事”^㉔，就是按照法治的政治标准挑选官吏将帅，衡量人的才能授予官职。他们还提倡“猛将必发于卒伍”^㉕，认为只有选拔那些在军队基层经受过锻炼、有实践经验的人担任指挥，才能把军队治理好。这对“不战而荣，无爵而尊”^㉖，世世为官的奴隶主贵族，也是一种打击。春秋战国时期法家的这些思想，对后来的法家代表人物也有很大的影响。例如，汉高祖刘邦和汉武帝刘彻在用人上都主张选贤任能、量才录用。刘邦用的武将很多出身贫贱，樊哙是个屠户，周勃当过吹鼓手，灌婴是绸贩。刘彻则把奴隶出身的卫青提拔为大将



军。曹操在用人问题上也主张“唯才是举”，要选那些“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②的人治理国家，管理军队。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林彪，是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在军队建设上，他推行一条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也效法儒家“以礼治军”。他反对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部队。他的所谓“突出政治”，实际上是突出地主资产阶级政治，就是妄图用地主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腐蚀我军的灵魂，改变我军的性质。他还妄图以“四好为纲”代替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他为了反革命的目的，还炮制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不能指挥军队的谬论，疯狂反对**党指挥枪**的原则，反对党对军队的领导。他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法西斯林家世袭王朝，在军队中拉山头，搞宗派，任人唯亲，安插亲信，结党营私，甚至发展到纠集反革命力量，组织大小“联合舰队”，妄图发动反革命的武装政变。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是任何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所破坏不了的。林彪及其死党妄想推行“以礼治军”的路线，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广大指战员的抵制和反对。结果，和一切反动派一样，只是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

三

在作战指导思想上，儒法两家也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

以孔丘、孟轲为代表的儒家，为了维护奴隶主的统治，把天命观作为精神支柱，极力鼓吹“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借以麻醉和欺骗人民。这种思想反映在战争问题上，就是把战争的胜负归之于“天命”。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奴隶主头子出师前先对“天”祈祷，把自己的胜利完全寄托于“老天爷”的保佑。法家则反对唯心论的天命观，主张战争胜负决定于人，要按照客观情况来指导战争。春秋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孙武指出：“不可取于鬼神”，“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③。就是说，打仗不能靠祈祷鬼神，必须善于通过人了解敌情。法家的这种思想，是朴素的唯物论观点，相对地说，比较正确地反映了战争的客观规律。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国势大振，对外作战不断取得胜利。荀况亲自到秦国作了考察，认为秦国所以能取得胜利，“非幸也，数也”^④，即不是靠运气，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当时能够提出这种看法，也是难能可贵的。

儒家所处的反动没落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正确地认识战争的客观



规律，总是用唯心主义来指导战争。与儒家相反，法家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比较注意分析和掌握战争的客观规律，强调调查研究。孙武认为，战争胜负首先决定于客观条件，不能单凭主观愿望办事。他详细分析了决定战争胜负的各种因素，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著名论断。孙臆进一步发展了孙武的军事思想，强调要“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知民心，外知敌情”^⑩，并且提出“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⑪，主张根据敌我各方面的不同情况来指挥打仗。对于法家这些先进思想，毛主席给予了很高评价。毛主席指出：“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并且说，它“仍是科学的真理”。

“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儒家从唯心主义的观点出发，在战略战术上必然机械呆板，墨守陈规。这种机械呆板战术的典型可算是儒家宋襄公了。公元前六三八年，楚国与宋国在泓水（河南柘城县北）交战，宋军本来处于有利形势，但是，由于宋襄公主张“不鼓不成列”^⑫，一直到楚军准备好了以后，才下令出击，结果宋军大败，宋襄公身负重伤，几乎当了俘虏。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尖锐地指出，这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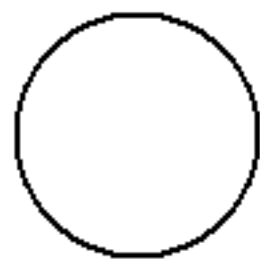
和儒家相反，法家从战争的客观情况出发，提出了一套比较灵活的符合实际的战略战术。孙武认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强调“因敌变化而取胜”。在战术上法家主张，要以多胜少，即所谓“十则围之，五则攻之”^⑬，要“避其锐气，击其惰归”^⑭，“辟（避）而骄之，引而劳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⑮，“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⑯，即利用敌人的弱点，造成敌人的过失，避开敌人主力，避免同敌人正面作战，设法调动敌人，力求在运动中予以歼灭。他们曾运用这些战法，打过一些有名的胜仗。马陵之战就是突出的一例。公元前三四〇年，魏国和赵国进攻韩国，齐国的田忌带兵救韩，孙臆针对魏兵勇悍但骄傲轻敌的弱点，避开正面作战，假装败退，将太子申和庞涓率领的十万魏军诱至马陵，以伏击的手段，打得魏军大败，俘虏了太子申，使庞涓兵败自杀，魏军几乎全军覆灭。

叛徒、卖国贼林彪步儒家的后尘，以唯心论的先验论代替客观规律，胡说什么“下意识都能指挥好”，打仗凭“一念之对”，就“可以代替几个军的作用”。在作战方法上林彪也继承了儒家的衣钵，公然反对毛主席关于“力求在运动中歼灭



敌人”的方针，不顾条件，鼓吹打“堂堂之阵”的阵地战。他无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根本目的，极力鼓吹拚命主义，胡说什么“十万人上战场，准备打掉五万”。他对抗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 and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公然鼓吹打击溃战，把复杂多变的战术，简单地机械地规定为什么“一点两面”、“四快一慢”、“三种情况、三种打法”等所谓“六个战术原则”。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大杂烩，是地地道道的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林彪搞的这一套黑货，与历史上儒家代表人物所炮制的机械、呆板、模式化战术，完全是一路货色。

毛主席指出：“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在我国两千多年儒法军事思想斗争的历史上，随着阶级斗争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战略战术也不断发生变化。毛主席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深刻总结了我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为我军制定了无产阶级的军事路线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这是指引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在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发展的形势下，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认真总结儒法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经验，就可以进一步认清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反动实质，提高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自觉性，从而使我军永远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注：

- | | |
|-----------------------|------------------|
| ①② 《孟子·离娄》 | ①⑦①① 《商君书·君臣》 |
| ③ 《荀子·臣道》 | ①⑧ 《管子·治国》 |
| ④①⑤ 《韩非子·亡征》 | ②②②③ 《荀子·议兵》 |
| ⑤③③⑤ 引自一九七四年第三期《文物》杂志 | ②②②③ 《韩非子·有度》 |
| ⑥ 《论语·尧曰》 | ②④ 《韩非子·人主》 |
| ⑦ 《左传·昭公二十年》 | ②⑤ 《韩非子·显学》 |
| ⑧ 《盐铁论·未通》 | ②⑦ 《曹操集·举贤勿拘品行令》 |
| ⑨ 《礼记·儒行》 | ②⑧ 《孙子·用间》 |
| ⑩ 《礼记·仲尼燕居》 | ③①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
| ⑪⑫ 《孟子·梁惠王》 | ③②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
| ⑬⑲ 《商君书·画策》 | ③③ 《孙子·谋攻》 |
| ⑭⑳ 《商君书·农战》 | ③④③⑤ 《孙子·军争》 |
| ⑱ 《韩非子·五蠹》 | |



论法家与“清官”的根本区别

天津铁路分局天津站工人理论小组

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历史经验的过程中，有人提出：过去我们批判“清官”论，和今天肯定法家的历史进步作用，是不是矛盾的？肯定法家同歌颂“清官”，是不是一回事？对于这个问题，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清是非，给予明确的回答。

一九六五年，围绕着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而引起的对于“清官”问题的讨论和批判，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向党进攻的激烈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发展为对“三家村”的批判，矛头直指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时间过了将近十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今天，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重新接触“清官”问题，不仅清楚地看到法家与“清官”完全是两回事，而且能够站在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新高度，更深刻地认清和批判“清官”论的尊儒反法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本质。

“清官”与法家并不是一个概念，相反，它是儒家炮制出来用以欺骗毒害人民、维护反动统治的东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就有所谓“义”、“利”之争。孔老二说什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轲对梁惠王也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他们把维护奴隶制和有利于奴隶主剥削压迫的行为叫做求“义”，而把奴隶们求生存、反抗剥削压迫的行为叫做求“利”。到了汉朝，董仲舒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思想。他把封建的纲常、道德等等，概括为一个“道”字，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说“求财利”是应该鄙视的“小人”的事，“求仁义”才是崇高的“君子”的事，并且说：“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春秋繁露》）到了宋朝，二程、朱熹把这种思想发展成为“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儒家的这种所谓重义轻利的叫喊，不过是他们维护封建制度、防止人民“犯上作乱”的道德说教而已。封建统治阶级以超阶级的“清”和“贪”来划分官吏，其思想渊源就是儒家的



义利观和地主阶级的人性论。“清官”，实际上就是儒家道统在政治上的人格化身。“清官”如同“孝子”、“节妇”一样，是封建统治阶级所宣扬的“三纲五常”等等一套封建伦理道德的样板。

历代封建统治者树立了一批象“包拯”、“海瑞”这样的“清官”典型，并给他们加封什么“孝肃”、“忠介”一类的名号，把他们捧上了天，吹得神乎其神。其目的无非是借助他们宣扬“德治”、“仁义”、“三纲五常”那一套孔孟之道，以此“治人”、“化民”，维护反动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吹捧“清官”与吹捧儒家是一致的。如同孔老二的身份越抬越高一样，“清官”论也是到了封建社会的中后期越叫越响。宋明以后，通过史书、笔记、戏曲、小说广为提倡和渲染，明清之际，尤为盛行。对于一个朝代来说，也是越到接近灭亡的晚期，“清官”论越叫得厉害。这种现象决不是偶然的，它是同封建社会的没落、某一王朝的衰亡相联系的，是同阶级斗争的激化相联系的。以前有句话，叫做“乱世出清官”。其实，哪里是“出”，纯粹是“喊”，越“乱”越“喊”。这个“公案”，那个“公案”，这个“清官”，那个“青天”，喊得越响，表明封建统治阶级的情况越是不妙。但是，不管喊出多少“清官”大老爷，到头来也挽救不了封建地主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法家并不是儒家所说的“清官”。他们在历史上是新兴地主阶级或地主阶级革新派的代表。法家一出现，就同儒家水火不容，势不两立。他们在不同时期，都用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揭露、批判了孔孟之道，特别是揭露、批判了儒家鼓吹的“德治”、“仁义”“忠孝”等说教的虚伪性和反动性。战国时期，法家商鞅把这一套比作咬人吃血的虱子，认为不去掉这些虱子而任其泛滥，国家“必弱”。法家韩非指出，这套反动说教是“愚诬之学”，“亡国之言”。西汉法家桑弘羊针对儒家攻击他“贪利”，反驳说，正因为“内立法度”，“外设百倍之利”（《盐铁论·非鞅》），才使国家由弱变强。他痛斥那些口称“仁义”的儒家是一帮“危不能安，乱不能治”（《盐铁论·殊路》）、“洁言污行”、“鸡廉狼吞”（《盐铁论·褒贤》）的巧伪人。宋朝法家王安石，针对孔老二鼓吹的“三畏”，提出了“三不足”的口号，并且以蔑视的态度指出：“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宋史·王安石传》）明朝法家李贽，尖锐地揭露儒家是一群“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的两面派。这些事实说明，法家始终是儒家的对立面和批判者，也是体现孔孟之道的所谓“清官”的对立面和批判者。我们肯定法家的历史进步作用，正是肯定他们批判孔孟之道的进步作用，怎么能同歌颂“清官”是一回事呢？在历史上，反动统治者或儒家曾把一些法家别有



用心地列到“清官”里去，那是他们为了掩盖儒法两家的斗争，混淆儒法两条路线的原则区别，消除法家的影响，而用儒家“清官”的面貌歪曲法家的缘故。这种现象正好是儒法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应当透过现象看本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体现剥削阶级利益、意志和要求的法律、法庭和执行统治权力的官吏等，只能是奴役、压迫被剥削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在剥削阶级中，决没有替被剥削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说话、办事的“清官”大老爷。马克思指出：“**如果认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可以有公正的法官，那简直是愚蠢而不切实际的幻想！**”（《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这话真说到我们心里去了。我们劳动人民清楚地记得，清朝的衙门口、帝国主义的宪兵队、国民党的警察局，哪个不是维护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旧社会里，“善人”不善，“清官”不清。“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这是我们劳动人民对“清官”论的有力否定。《红楼梦》第四回里，贾雨村把维护贾、史、王、薛四大封建家族的财势作为“护官符”，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连他的恩人尚且不顾，对劳动人民就更可想而知了。其实，那些口称“清官”、鼓吹“仁义”的儒家之徒，没有一个不是贪利的。这些平时大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清官”，真要见了利，就象苍蝇见屎一样，眼红心动，丑态百出。

毛主席指出：“**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清官”论正是否定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美化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抹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明明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反动派却宣扬“清官”对农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隋书·循吏传》）。明明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调和的，反动派却把“清官”统治的地方描绘成“政务宽和”、“政平讼理”、“吏不敢欺”、“人怀其惠”（《晋书·良吏传》）的一种升平景象。反动统治阶级鼓吹“清官”论的目的，就是要造成一种忠君“爱民”的偶像，给人民群众一种幻想，似乎人民群众不需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只要等待统治阶级中某一个“清官”大老爷的恩赐，就可以过“好日子”，借以麻痹农民的革命斗志，或者把已经发展起来的农民革命引到邪路上去。这种宣传，在历史上曾经迷惑了一些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农民。《水浒》的作者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小说里一些农民起义军



用“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的歌词表达自己的心愿，正是这种“清官”论欺骗作用的反映。有些封建统治者就曾直接利用“清官”这个招牌来瓦解农民起义。明代中期，黄萧养领导农民起义队伍包围了广州城，封建皇朝见武装镇压失败，就派了当时有名的“清官”杨信民去用软的一手“多方招抚”。农民起义军被“清官”迷惑，放松了武装斗争。结果，遭到董兴调集的两广、江西地主军队的血腥屠杀而失败，黄萧养也中箭牺牲。清朝中期，河南、湖北、四川等省白莲教组织农民大起义，四川总督派号称“刘青天”的南充知县刘清，到农民军中去诱降，农民领袖王三槐因此中计被捕。这些“清官”毫无例外地都是口讲孔孟之道的儒家。许多农民运动由于没有先进阶级和先进理论的指导，常常在“清官”、“好皇帝”的诱惑下，为反动统治阶级所利用，因而遭到了失败。“清官”论在政治上是反动统治阶级配合武装镇压农民起义，破坏农民革命的重要手段，在思想上是他们利用孔孟之道束缚人民，执行“牧师职能”的方法之一。“清官”论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论。

历史上法家的作用与所谓“清官”的作用是截然相反的。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在奴隶起义的基础上，顺应历史潮流，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提出了一条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用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的革命路线，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任务，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西汉以后，地主阶级逐渐走向反动，法家作为地主阶级中的革新派，在农民运动的推动和影响下，敢于批判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敢于在不同程度上揭露封建王朝的腐朽黑暗。他们对于解决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危机，不是寄希望于“清官”和孔孟之道，而是从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比较务实，提出一些有利于生产发展，有利于科学文化发展，有利于国家独立统一的措施，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尽管这些作用受到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没有也不可能根本解决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但就他们的思想政治路线来说，与地主阶级中的反动派，与儒家路线，是完全不同的。正因为这样，反动的封建统治者和儒家之徒，对待法家同对待所谓的“清官”，就大不一样。一个是骂，一个是颂；一个是压，一个是捧。他们对法家恶毒咒骂，疯狂攻击，百般迫害，致使不少法家代表人物遭贬职、排斥、监禁甚至丢掉生命。这种情况也说明了法家和所谓“清官”有根本区别。我们肯定法家的历史进步作用，正是为了彻底否定“清官”论，彻底批判孔孟之道，把批林批孔的斗争深入下去。

刘少奇、林彪站在修正主义的反动立场上，尊儒反法，“清官”论就是他们吹



捧孔孟之道的一个重要内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是一个儒家学派的忠实信徒，也是“清官”论的鼓吹者。他居然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时候，用儒家“清”与“贪”的对立，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歪曲为“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这是“清官”论在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形式下的复活和翻版。毛主席彻底批驳了这种谬论，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按照刘少奇的提法，就会抹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就会以孔孟之道代替马克思主义，使运动走到邪路上去。叛徒、卖国贼林彪步刘少奇的后尘，一面大骂法家是“罚家”，一面叫嚷“大家都当董仲舒”，妄图以鼓吹“清官”论的董仲舒为榜样，改造党的干部队伍，为他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服务。但是，他同历代鼓吹“清官”论的反动家伙一样，遭到了可耻的下场。

这些事实说明，“清官”论是地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阻碍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个思想武器。这正好同我们今天肯定法家的历史进步作用形成鲜明的对照。从方法上看，一个是借古讽今，一个是古为今用；从矛头所向来看，一个是对准人民革命，对准社会主义，一个是对准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对准林彪反党集团，对准孔孟之道；从政治目的来看，一个是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分裂党、分裂人民，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一个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维护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立场，根本不同的路线。

用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观点来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肯定法家的历史进步作用，是马克思主义的；用地主阶级人性论来划分“清官”与“贪官”，歌颂“清官”的反动作用，是修正主义的。今天，我们把“清官”论摆到儒法两条路线斗争中来看，进一步看清了它的反动本质，进一步分清了肯定法家的历史进步作用同歌颂“清官”的本质区别。我们天津站的工人，在党的领导下，与全国人民一道，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儒法斗争史，更加丰富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经验，提高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增强了革命干劲。我们要继续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彻底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的孔孟之道，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



正义战争必然胜利

——批判《盐铁论》中儒家的军事投降主义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三八九舰理论小组

今年一月，我们舰在参加西沙自卫反击战中，遵循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在上级党委的正确指挥以及兄弟部队和民兵的密切协同下，为党为人民荣立了集体一等功。战后，指战员们发扬我军能武能文的革命传统，联系这次战斗实际，以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为武器，研究儒法军事路线斗争的历史，深挖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思想根源，提高了贯彻执行毛主席军事路线的自觉性。

我们研究了《盐铁论》中儒法两家关于战争问题的论战，认识到当时围绕着战争问题而展开的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儒家竭力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法家则针锋相对，坚持一条抗战的正确路线。西汉中期，地主阶级顺应历史潮流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奴隶主残余势力不断受到打击，地方诸侯王割据势力一再被削弱。隐藏在中央政权内部的复辟势力、地方诸侯王、工商奴隶主，便把实现复辟的一个重大希望，寄托在我国北方匈奴奴隶制军事政权对西汉内地不断发动的军事侵扰上。他们暗里与匈奴奴隶主串通一气，妄图里应外合，明里制造谣言，施展骗术，推行军事投降主义。汉武帝去世以后的第六年，在复辟势力为了猖狂反扑而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反动儒生射出了两支毒箭，一支射向坚持加强中央集权的法家政治路线，一支射向主张抗击匈奴侵扰的法家军事方针。杰出的法家、御史大夫桑弘羊，坚决保卫中央集权的法家路线，并在战争问题上同投降主义者展开激烈论战。桑弘羊摆事实，讲道理，义正词严地舌战群儒，把他们批驳得理屈词穷。

西汉儒家在政治上“克己复礼”，搞倒退，在战争问题上对匈奴奴隶主阶级发动的军事侵扰，实行投降主义。叛徒、卖国贼林彪，也是一面大搞“克己复礼”，



一面充当社会帝国主义的“超级间谍”，叫嚷要借苏修力量“箝制”国内外革命力量。事实有力地说明，古今反动派要在政治上搞反革命复辟，在军事上就必然要在反动倒退势力的武装入侵面前屈膝，推行投降主义路线。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这就是说，战争这种东西是具体的，或者是正义的、革命的、推动历史前进的战争，或者是非正义的、反革命的、妄图倒转历史车轮的战争，决没有既不是前者又不是后者的抽象的战争。区分战争性质也有严格的尺度。列宁指出：“战争的性质（反动战争或是革命战争）不取决于是谁进攻，‘敌人’在谁的国境内，而取决于哪一个阶级进行战争，这个战争是哪一种政治的继续。”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任何战争都是一定阶级为推行一定的政治路线而采取的军事手段，是流血的政治斗争。政治路线的性质决定了为这一政治路线服务的战争的性质。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逆着历史发展的趋势，推行一条维护和复辟反动落后的社会制度的政治路线，并为此而发动的战争，就是非正义的战争；被剥削阶级和处于上升时期的进步阶级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推行一条建立和巩固先进的社会制度的政治路线，为此而坚决抗击反动倒退势力的武装进攻，这类战争就是正义的、革命的战争。西汉时期我国北方落后的匈奴奴隶主政权侵袭中原，大肆掳掠人口和财富，这样的战争是要使历史倒退，加重人民的苦难，显然是非正义的反动的战争；西汉王朝为巩固封建制中央政权，抗击匈奴奴隶主武装侵袭，这类战争符合人民的愿望，因而是正义的革命的。

在盐铁会议上，孔孟之徒蓄意抹杀两类战争的不同性质，大肆渲染战争恐怖，叫喊什么“大军之后，累世不复”、“田地日荒，城郭空虚”、“老母垂泣，室妇悲恨”，并把这一切笼统归咎于“战争”。桑弘羊及其助手盛赞了汉武帝坚持抗匈战争给西汉社会带来的兴旺景象，列举了汉朝建国初期与匈奴“和亲”妥协反而招致“暴害不息”的事实，指出“战争灾难”是匈奴奴隶主发动掠夺战争造成的，抗匈战争则是“兴义兵以诛暴强”，从而粉碎了孔孟之徒混淆两类战争，用战争恐怖恫吓人民，妄图使人民不敢起来抗击匈奴奴隶主掠夺的阴谋。

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对壮丽的共产



主义事业有着崇高的献身精神。他们不但能够分清两类性质不同的战争，在修正主义者、投降主义者散布的“战争恐怖”瘟疫面前具有强大的免疫力，而且能够高举正义战争的旗帜胜利前进。林彪同盐铁会议上的反动儒生一样，混淆两类战争的性质，宣扬战争的所谓残酷性，妄图投靠苏修，实现他变社会主义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迷梦，只不过是痴心妄想。在西沙自卫反击战中，我参战军民为保卫祖国领土，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江山，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这是对正义战争的颂歌，也是对儒家和林彪投降主义谬论的有力批判。

马克思主义认为，反革命的暴力必须用革命的暴力去对付。我们分清两类性质不同的战争，对正义战争采取拥护和积极参加的态度，对于非正义战争采取抵抗和坚决反对的态度。但是，向非正义战争投降的叛徒们，为了反对革命暴力，却制造了许多奇谈怪论。林彪不是叫嚷什么“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吗？其实，林彪和孔孟这种骗人的鬼话，早就被桑弘羊戳穿了。在盐铁会议上，孔孟之徒对抗匈战争的一个谬论，就是鼓吹“去武行文，废力尚德”，宣扬匈奴奴隶主发动掠夺战争的本性可以用孔孟道德加以感化，不必以牙还牙，以战去战。桑弘羊及其助手在会上摆了大量事实，辛辣地嘲笑了孔孟之道的无用，斩钉截铁地指出：对待掠夺者只能“武折”，不能“德怀”。就是说，只能以强大的武力去粉碎反动派的武装进攻。

儒家说，对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可以用“行文”、“尚德”的办法感化它，使强盗萌发善心，这实际上就是说，反动派的本性可以改变。毛主席曾经尖锐地批判过这种论调。毛主席指出：“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反动阶级发动非正义战争，有其深刻的政治上经济上的根源。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以垄断为基本经济特征的资本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决不会放弃在世界范围内争夺销售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他们重新瓜分势力范围和世界领土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超级大国在欧洲，在中东和地中海，进行着剧烈的争夺。经济上的争夺，政治上的扩张，在一定条件下，就会演变成为军事上争夺世界霸权的冲突。匈奴奴隶主对西汉内地的掠夺，也不是出于某个匈奴单于的个人意志，而是整个奴隶主阶级反动意志的表现，它同样



取决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决不是靠什么“行文”、“尚德”所能改变的。如果汉武帝不采取坚决抗战的方针，派大将卫青、霍去病统率大军多次出兵还击匈奴，西汉新兴的地主阶级政权就要被腰斩，社会就要由封建制倒退到奴隶制。可见，对待一切反动派决不可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要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毛主席指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帝国主义的傀儡南越西贡政权，不顾我国严重警告，以武力威胁我渔民，撞坏我渔船，向我执行巡逻任务的舰艇开枪开炮，不是我军民毅然进行了自卫反击，用武力斩断了西贡反动派伸向西沙的黑手，五星红旗就不可能依然飘扬在伟大祖国西沙群岛的上空。

正因为反动没落阶级的掠夺本性是不能改变的，要保卫进步的社会制度，保卫人民胜利果实，就必须既在精神上，也在物质上不断加强进行正义战争的准备。在盐铁会议上，孔孟之徒打着关心人民生活疾苦的幌子，反对法家在经济上的进步措施，妄图破坏进行抗匈战争的经济基础。他们攻击和诽谤盐铁官营等政策违背了孔孟鼓吹的“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的原则，“与民争利”，是什么“民间”一大“疾苦”。桑弘羊揭下了他们这副假面具，反驳说道：如果取消盐铁官营，就必然是“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今不征伐则暴害不息，不备则是以黎民委敌也”。桑弘羊一针见血地揭穿了孔孟之徒的罪恶用心，是要破坏战备，把人民交给匈奴奴隶主宰割。

恩格斯说：“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的条件和资源帮助‘暴力’取得胜利，没有它们，暴力就不成其为暴力”。汉武帝所以能在短短八年里，对匈奴奴隶主政权的军事侵扰发动了三次大规模反击，纵横驰骋，所向披靡，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由于实行了盐铁官营等一系列法家的经济政策，使西汉王朝获得雄厚的经济力量，实现了“兵革东西征伐，赋敛不增而用足”。战前的精神和物质的准备是战时胜利的必要条件。我们参加西沙自卫反击作战的部队，经过战斗实践，更是深深体会到，西沙之战取胜在西沙，胜利的基础却是在全国。这个胜利，正是由于全国人民、全军指战员坚决执行了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使国家有雄厚的经济力量，为我们提供良好的技术装备及其他物质保证。叛徒、卖国贼林彪反对毛主席制定的战略方针，妄图削弱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力量，破坏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然而，林彪的阴谋是注定不能实现的。



凡是叛徒，凡是在军事上搞投降主义的人，总是要看大反动派的武装力量，看小革命阶级的抗战能力，长敌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西汉孔孟之徒也不例外。他们竭力夸耀敌军的厉害，把匈奴的骑兵描绘得十分神奇难打，“就之则亡，击之则散，未可一世而举”，叫嚷抗战下去就会招致“刎颈之祸”、“死亡之患”。桑弘羊却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气概指出：“以义伐不义，若因秋霜而振落叶”。匈奴奴隶主头子的历史命运，不就是一片枯黄的落叶吗？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我们应当坚持毛主席关于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原则，去对付并战胜一切反动派。

毛主席教导我们：“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既然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最后胜利就一定属于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赢得人心的正义战争。尽管进行这一战争的新兴力量开始时处于暂时弱小状态，它一定会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以小胜大，以弱胜强，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处于上升时期的地主阶级，是要求变革、要求前进的力量，反映了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要求，因而它终于在战争中战胜了表面上强大实际上腐朽没落的奴隶主阶级。至于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群众直接领导、直接进行的奴隶战争、农民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战争，则更是直接显示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正是由于奴隶战争、农民战争发挥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作用，才为新兴地主阶级创造了胜利的条件，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封建制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才有可能出现。没有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极大地摇撼了被奴隶主复辟势力代表赵高篡夺了领导权的秦王朝统治，刘邦领导的起义军又继往开来，在同项羽集团复辟势力的斗争中执行了法家路线，就没有西汉王朝，因而也就没有抗击匈奴奴隶主政权侵扰的战争的胜利。

顺应历史发展的正义战争，必然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必然有着胜利的前途。这个在大量历史事实中显示出来的规律，是一切进步阶级、尤其是今天无产阶级建立必胜信念的基石。这个信念能够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这个信念是林彪和孔孟之徒散布的投降主义、失败主义所动摇不了的。正是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我们怀着这一信念取得了西沙之战的胜利。我们将继续百倍警惕地保卫着祖国的海疆，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敢于来犯的敌人！



支持新生事物 发展大好形势

在银幕上为无产阶级争光

——影片《闪闪的红星》的一些创作体会

八一电影制片厂《闪闪的红星》创作组、摄制组

彩色故事片《闪闪的红星》的创作，是我们学习革命样板戏的一份考卷。它的诞生，是党亲切关怀和直接支持的结果，是革命样板戏登上银幕、推动电影艺术革命的产物。一句话，它是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光辉照耀下，边学边闯地搞出来的。

下面，想就这部影片的创作实践，谈一些初步的体会，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从路线的高度开掘题材，提炼主题

《闪闪的红星》原著是一部有特色的中篇小说。它为改编电影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是，从小说到电影，不是简单的艺术形式的改变，而是从生活出发，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进一步典型化，进行一次认真的再创作。

进行艺术构思，首要的一条，就是立意要高。所谓立意高，是指主题思想和英雄形象的基调要高。这部影片主要是写儿童、给儿童看的，但它不是一般的儿童片。我们不能向文化大革命以前拍的那些儿童片靠拢，不能追求修正主义宣扬的“儿童趣味”，也不能追求虚假的紧张情节和惊险动作；不仅不能追求这些东西，而且应该坚决摒弃它，批判它，战胜它。我们的未来是属于下一代的，我们的创作就必须对革命负责，对下一代负责，让无产阶级的崇高思想和革命传统代代相传。

怎样才能达到立意高呢？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从路线的高度，对题材进行严格的开掘，对主题进行反复的提炼，努力刻画英雄人物的典型



性格，立意才能高。立意高不是脱离实际的高，而是在深刻地、典型地反映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矛盾和斗争的基础上而达到的较高的思想境界。学习这一宝贵的经验，把它运用到这部影片的创作中来，就需要结合我们所掌握的生活素材，和小说作者一起对原著所表现的革命斗争生活进行深入的再开掘。

我们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开始，我们仅仅着眼于小冬子“在红星下成长”。围绕着这条线，对原作的人物作了些调整、合并，时间跨度作了些压缩。结构起来一看，象个电影设想了，但是又感到不满足：立意还是不够高，小冬子仍然处于被保护的地位，他的思想、行为还不能光彩照人。原因就在于我们对题材开掘得不够深，没有抓住路线这个纲。

于是，我们重新研究原作所反映的斗争生活，进行再认识。沿着“在红星下成长”这条线深入下去，和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联系起来分析，我们剖视到小冬子所经历的那段历史时期，突出的问题是：革命成果“得而复失”。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引导着革命战争节节胜利和红色根据地不断扩大，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则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引来了阶级敌人的复辟，把绝大部分的革命成果都断送了。革命成果的得失过程，深刻地表明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对了，就有了一切；路线错了，就丧失一切；当错误路线被否定之后，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又可以经过斗争夺回革命成果，赢得新的胜利。四十年前我党历史上的这一深刻教训，对于我们今天以及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自觉地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仍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而，抓住“得而复失”的问题深入开掘，从路线的高度揭示这一场复辟与反复辟斗争，既使影片的立意有所提高，又赋予这一革命历史题材以新意，也为小冬子的成长找到了历史的依据。

我们的认识并没有到此结束。现实中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又给了我们新的启示。在我们创作过程中，欣逢党的十大胜利召开。十大文件强调指出，要在群众斗争中“**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个“千百万”，都是从儿童团过来的。要重视儿童团，决不能轻视儿童团，这一光辉思想又进一步照亮了我们的构思。我们觉得，把小冬子放在复辟与反复辟斗争大起大落的背景中去，还只是写了他的典型环境这一面；而要突出在大背景中的小英雄典型性格，我们的立意还必须“更上一层楼”，用我们构思时的语言说，就是要表现出“**儿童团斗垮还乡团**”。如果没有充分表现出儿童团的光和热，那只能表明创作人员还没



有充分认识到革命的新生力量是不可战胜的这一伟大真理。冬子的童年，是英雄的童年，他不是等待胜利中慢慢长大，而是在夺取胜利中迅速成长，因此，必须大大加强冬子为夺回红色江山而斗争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只有强调了冬子的“夺”，突出了他的斗争性格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才能使人物上升为一个“顺着革命的路子走，按着革命的需要长”的无产阶级少年英雄典型。

我们把冬子放在最能反映路线斗争的特定环境中去刻画，并不是要让孩子直接阐述路线斗争，而是把他的命运和路线斗争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冬子从一个小奴隶变成了革命的小主人，牵着大土豪胡汉三游街，扛起了红缨枪去上学；可是，由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斥了毛主席的领导，冬子又吃二遍苦；而在遵义会议确立毛主席的领导地位之后，革命重新蓬勃发展，冬子也在斗争中迅速成长为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通过冬子经历的道路和具体感受，就从一个特殊的角度上，把两条路线作了鲜明的对照，批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罪恶，歌颂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我们的创作目的就在于通过冬子的形象，使我们的年轻一代记住：坚持或者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关系到中国革命成败的根本问题，应该永远发扬中国共产党培育下的儿童团的光荣革命传统，坚决、勇敢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持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夺来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掌握英雄的成长和成熟的辩证关系， 努力塑造英雄的典型性格

在创作中，我们曾不断听到这样的疑问：十岁左右的小冬子毕竟是一个成长中的少年英雄，而不是成熟的革命先锋战士，他能不能作为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来塑造？能不能成为影片的主要英雄人物？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革命少年儿童在实际生活中的地位，决定了他们在文艺作品中的地位。从红军时代的儿童团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小兵，曾有过无数与冬子年龄相仿的孩子，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既然现实生活里涌现过那样多少英雄，那么，在我们的文艺作品中就应该使他们的英雄形象比实际生活中更高、更理想、更典型、更带有普遍性，成为“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的榜样。根据现实斗争的需要，从影片特定的题材和主题出



发，在银幕上塑造好冬子的英雄形象，为儿童团高唱一曲革命赞歌，不仅为今天的青少年树立一个学习的榜样，而且对于从儿童团过来的老一辈革命战士，也是一次幸福的回忆。

对于英雄人物的成长和成熟的关系，我们认为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理解。成熟，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不是静止的，而是发展的；更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斗争实践中成长的结果。伟大的群众斗争必然造就出许多杰出的英雄，他们从斗争中学会斗争，在思想上、才干上成长的速度往往超过年龄的递增，这是为我们伟大的时代所证明的事实。革命样板戏塑造的许多光彩夺目的英雄人物，一出场就具有很高的思想起点，而随着矛盾冲突的层层激化，他们的英雄形象又越来越高、丰满。这说明，文艺作品中的英雄人物的思想是在矛盾冲突的发展过程中成熟起来的，对英雄的刻画应该从他不断成长、臻于成熟的过程中来完成。

根据这样的理解，我们把冬子这一英雄人物的发展过程和相对成熟统一起来，把他的成长和高大统一起来，尽力在银幕上树立起一个可爱、可信、可学的“党的孩子”的光辉形象。

一、在冬子的身世、经历和斗争环境所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提高他的思想起点；牢牢把握他在成长过程中的性格特色。

冬子一出场，是一个年仅七岁的苦孩子，但我们没有在“苦”字上做文章，而是通过他想红军、盼红军的“开场白”，表现其强烈渴望翻身闹革命的阶级情感，通过他与胡汉三第一次直接交锋时的“亮相”，表现其朴素的反抗精神。这样，从一开始，就阐明冬子性格的阶级特色，使他的起点高于一般的革命儿童。

我们坚持从正面描写冬子的“党的孩子”的形象，时刻不忘他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少年英雄，决不片面地强调他“仅仅是一个孩子”而降低他的思想高度；同时，也不把他变成“小大人”。他在即将去远征的父亲面前立誓要“使劲长”，长大了也当红军，他的语言充满了孩子气，但也透出了“党的孩子”的气质。他巧妙地筹盐过卡，又嘲弄敌人哨兵，他的行动是机智的，也是顽皮的，是属于一个可爱的儿童团员所特有的。他把那碗多盐的野菜汤倒在大锅里，他把那件棉大衣披到放哨的叔叔身上，他的行为是崇高的，但这种优秀品质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直接从吴大叔、宋大爹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中学来的。凡此种种唯冬子所独有的性格特色，我们处处注意不把它磨平，不搞成一般化。



要突出英雄性格的美，还必须注意他的形体造型的美。这种美，也是有阶级性的，不可等闲视之。那种把工农兵英雄人物的形体造型搞成五大三粗的做法，同把他们打扮得华丽、纤弱一样，都是丑化和歪曲。在冬子的形体造型上，特别是肖像造型上，我们强调要健美、挺拔，富有革命光彩。根据冬子特定的生活道路，我们为他设计了苦孩子、儿童团员、小篾匠、小学徒和小红军战士等一系列形体造型；并在摄影上利用阶调层次丰富、立体感强的光效（如顶逆光、轮廓光、眼神光等），勾勒他的肖像的美。既突出他质朴深厚的劳动人民气质，又体现时代、环境和年龄的特点，力求通过艺术造型表现其丰富的精神世界，达到精神美和形体美的统一。熬盐吹火时，冬子那件红艳艳的背心，辉映着焯焯火光，烘托着他朝气蓬勃的革命风貌；米店劈柴时，冬子那把柴刀的有力起落，显示出他决心要劈开旧世界的顽强革命精神。

二、正确处理冬子与革命长辈之间的关系，坚持以冬子为中心，以冬子为落点。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颇有意味的矛盾现象：冬子是主要英雄人物，却是被教育者；他的革命长辈是教育者，却是次要英雄人物。两者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要么是贬低了革命长辈的形象，使冬子的性格失去了根基；要么是孤立地突出了其他英雄人物，压低或湮没了冬子，使他相形失色。处理好这个关系，关键就在于：每一场戏，特别是重场戏，都要围绕着冬子安排，其他英雄人物的戏都要落在冬子身上。如果不落，就是压戏；如果落得不准，就会夺戏；如果落得好，就是垫戏。

掌握了这一环节，就可以放手把其他英雄人物写好。父亲把麻药让给其他伤员，自己忍痛动手术，是写父亲的戏，目的则是让冬子懂得：为了消灭所有的白狗子，使人民永远得解放，就要不怕苦，不怕死。母亲为掩护群众而献出自己的生命，是写母亲的戏，但落点仍在冬子身上，是为了熔铸冬子对党、对人民、对毛主席的阶级深情。在导演、摄影处理上，我们同样依据这一道理，运用电影镜头具有选择性的特点，始终把冬子置于事件和观众视线的中心。父亲远征前夕，画外是父母纵谈革命远景和对后代的期望，画面却多次出现了冬子在帐子里屏息谛听的面孔。当父亲撩开帐子抚摸孩子时，冬子虽装着睡觉，却控制不住眼角的两行热泪。这样，让观众清晰地看到革命长辈以自己的言行，把毛泽东思想的雨露点点滴滴洒进这棵革命幼芽的心田，也真切地感受到冬子心里的巨大波澜。这样的处理，既符合革命斗争的实际生活，又做到了“水涨船高”，突出了冬子的英雄形象。

三、掌握冬子性格发展的连贯性和阶段性，把主要力量放到重场戏上去，突



出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

影片故事情节，是冬子性格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在对性格诸方面的描写中，既不是平均地、面面俱到地罗列，也不是孤立地、机械地拼凑，而是有主有从，主从结合，重点突出他性格的主要特征即主要侧面。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形象的深度与广度的统一。冬子敢于斗争，善于学习，对党和毛主席的深切热爱，是他性格的主要特征，整个情节就是围绕着这一主要性格特征而展开：紧扣住他同土豪胡汉三反复进行较量的矛盾冲突，把他在红星照耀下从苦孩子成长为红军战士的思想发展的脉络，理成一条单纯、清晰、连贯的纵线。同时，在纵线安排上，通过冬子勇敢地拦截胡汉三潜逃，坚毅地忍住悲愤劝阻群众下山救母亲，机智地筹盐过卡，沉着地掀起一场群众夺米风暴，最后火烧、刀劈胡汉三等几个典型事件，在各个阶段上有层次地刻画他的思想深度。这样，就使影片的矛盾冲突，始终以冬子为中心，一浪高过一浪地展开，也就一层深似一层地揭示出冬子从朴素的阶级感情发展到高度的阶级觉悟的成熟过程。

突出重点，把主要力量放到重场戏上去，从横断面上突出英雄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是我们塑造冬子形象的重要艺术方法。在冬子成长过程中，有思想最活跃、情感最激荡、英雄性格表露得最鲜明的重场戏，我们决不零打碎敲、轻易放过，而是力求做到象革命样板戏精心设计成套的重要唱段和核心唱段那样细刻深掘，把戏做透做足。母亲从光荣入党到英勇牺牲这一段戏，是冬子性格成熟的关键，我们就集中笔墨，作为塑造“党的孩子”的形象的核心部分来描写。母亲宣誓入党时，以传来遵义会议喜讯为背景，金色的曙光透窗而入，烘托着冬子决心学习母亲、誓做党的孩子的思想飞跃；母亲牺牲时，在那熊熊烈火的映照下，冬子的意志和党的要求已融为一体：“决不让群众吃亏”，是党对妈妈的要求，也是党和妈妈对冬子的要求，妈妈能做到的，他也能做到。在这里，我们为了强化冬子的感情高潮，用鲜明的两极镜头，多次重复展现了烈焰腾空的土楼和冬子激情澎湃的面容。一个比一个更大、更强的近景、特写镜头，刻画了冬子的感情起伏，表现出崇高的共产主义思想已在他内心扎下了根。

坚持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 为革命抒情，抒革命之情

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攻击我们无产阶级“没有感情”，“不会抒情”，我们必须通过文艺作品给予有力的回击。哪里有无产阶级的战斗生活，哪里就有无产阶级的



革命激情。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阶级，它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革命激情是最崇高、最壮美、最丰富的阶级感情。我们一定要坚持毛主席所指出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刻画英雄人物现实斗争中的精神面貌时，动人地展现出他的远大理想；在表达深刻的思想内容的同时，在银幕上充分地抒发无产阶级的革命激情，“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

为革命抒情，抒革命之情，首先要求创作人员对无产阶级英雄人物要有深厚的感情和正确的认识。冬子的经历中，有父亲远别，有母亲牺牲，当然决不能用修正主义的观点去渲染所谓“生离”与“死别”，但也不能因为怕犯这样的错误而“退避三舍”。我们不回避描写革命的挫折失败和斗争的艰难困苦，甚至于流血牺牲，但一定要突出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敢于抒发革命战士的豪迈激情和广阔胸怀。亲人行将远别，谈论的是入党、斗争和远大的革命理想；游击队风餐露宿，但透过一碗野菜汤、一件棉大衣和一个满装着群众心意的盐筒，洋溢着温暖的阶级友爱；错误路线使革命战士陷入白色恐怖，但是富有想象的“岭上开遍映山红”的歌声却倾诉了他们坚信革命必胜的乐观情绪；母亲英勇牺牲，一个战士倒下去，接着就是烈火化作红旗，无数个新战士走进革命行列。在这里，只要准确地把握革命事业发展的主流和英雄人物思想的本质，就可以大胆地抒发革命之情。

既要敢于抒发革命之情，也要善于抒发革命之情。我们在创作中决心抛弃那种“不求艺术上有功，但求政治上无过”的庸人哲学，决不做懒汉懦夫，而要刻苦琢磨电影艺术表现形式，努力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我们的电影艺术，应该充分运用色彩、音乐、电影语言等多种艺术手段，为无产阶级英雄创造出激越而深邃的艺术意境。

绿色，是我们这部影片色彩的基调。它既符合江南风光和人物斗争生活的环境特征，又含有丰富的思想寓意。我们力求绿色正确还原，做到银幕“出绿”，使整个环境气氛充满蓬勃朝气和盎然生机。郁郁葱葱的青山翠竹，烘托冬子天天向上的战斗童年和欣欣向荣的革命事业。但是，把绿色作为色彩基调，并不排除其他色调的运用，特别对红色的运用。红色象征着革命，象征着党；绿色象征着冬子如同一棵新生的嫩芽，也象征着“万物生长靠太阳”的革命群众。“万绿丛中一点红”，红星、红旗在影片中起着点题作用。在母亲入党一场戏里，我们从抒发人物革命激情的需要出发，着意突出了红色。这场戏第一个镜头就是一面鲜红的党旗，温暖的红彩充满着整个银幕。黎明前的黑夜，更把红色衬托得格外鲜艳夺目。当吴修竹畅叙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时，喷薄四射的红



日，云雾缭绕的高山，庄严雄伟的《东方红》乐曲，由色调、景物、音乐所构成的这种特定的环境气氛，和冬子与母亲心头激荡的革命激情融汇在一起，使影片具有高亢、壮美的格调。这里，自然主义是根本行不通的。

抒发革命激情，需要特别注意电影语言的充分运用。所谓电影语言，就是通过人物的动作、气氛的渲染和镜头的组接，由视觉形象和音乐形象交织成的无言的电影艺术意境。这种形象的电影语言，和精炼的文学语言是相辅相成的。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要求影片的对话要少。对话少而精，文学语言就突出了，电影语言也就多了，才能充分发挥电影综合艺术的特长。游击队营地之夜和冬子进姚湾镇筹盐，都是一句对话也没有，然而一系列少言以至无言的镜头，在相应的伴奏音乐烘托下，却“畅所欲言”地表现了同志之间、红军和群众之间深厚的革命情谊，展示出冬子在党和群众的温暖怀抱里幸福成长的意境。此处无言胜有言，多少丰富的思想内涵尽在这不言之中。当然，这种无言的电影语言一定要有鲜明的动作性，能让观众透视到人物内心的激情。例如，在冬子参加柳溪战斗的一节戏里，为了描写他未能参战又急欲参战的心情，原来的设计是：冬子被留在村外后，他急切地爬上树梢了望，又悄悄下树奔向战场。这样处理，不足以准确、细致地表现他的强烈情绪。经过多次琢磨，拍摄时才改为冬子在溪畔青石上霍霍磨刀。磨刀这一动作，为冬子提供了一个鲜明的视觉形象，既展现了他渴望参加战斗的焦急心情，又揭示出他内心起伏着强烈的阶级仇恨。

竹排激流一场，描写冬子在群众斗争的太学校里经受了锻炼之后，又踏上了新的征途。就情节发展而言，这不过是一场过场戏。但我们并没有把它当作一场平淡的过场戏，而是把它看作象杨子荣打虎上山那样来对待。在选择外景时，我们特别注意场面中一定要有湍急的激流，尽力显示大江东去的气势；拍摄透过竹林远眺竹排的时候，又特别挑选在竹叶翠绿欲滴的旺长季节，力求获得最理想的绿色和茁壮挺拔的形象。对这一镜头的摄影处理，采取了横移的拍法，通过竹林前后层次的交错移动，造成富有生命活力的动感。经过细致琢磨，最后才形成影片中的这个场面：巍巍青山，湾湾绿水，翠竹掩映江流，雄鹰搏击长空；祖国的雄伟山河，托起了冬子乘坐的小小竹排，闪闪的红星在他掌心中发亮，滔滔江水又把他送往新的斗争激流。这里没有一句对话，然而通过壮丽的画面和激扬的歌声，构成了一个充满革命的诗情画意的艺术境界，尽情抒发了冬子激流勇进的战斗豪情。

抒发革命之情，必须根据人物性格的发展，有时激昂，有时深沉，做到波澜起伏，不是平铺直叙。要含蓄、发人深思，力避浅露。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所



谓的“含蓄”，是要把他们的反动思想本质写得隐晦、曲折，使人捉摸不透。我们所要求的含蓄，是要表现出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激情的深度。冬子在米店的一段戏，我们总觉得在冬子走向成熟之后的斗争中，应有一段内心世界的剖视，于是，加了一场“夜谈”——在宁静的月夜下，两个小战友，仰望北斗星，向往延安，纵谈革命胜利后戴着红星去见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样一加，不但使整个影片节奏疾徐、张弛有致，进一步使艺术上虚实、动静结合，而且把冬子的精神境界又向上推进了一步；他把红星戴在椿丫子的头巾上，意味着他不仅把这颗闪闪的红星放在自己的心坎上，也放到了战友的心坎上，激励着战友的革命斗志，这表明无产阶级的崇高理想在他的身上发出了瑰丽的光彩。

坚持不懈地改造世界观、艺术观

回顾影片《闪闪的红星》的创作过程，我们深切地体会到：要深入地进行无产阶级电影艺术革命，创作出革命的电影艺术作品，必须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指引下，坚持进行思想革命，同资产阶级旧思想、旧作风、旧手法彻底决裂，不断增强革命的自觉性和责任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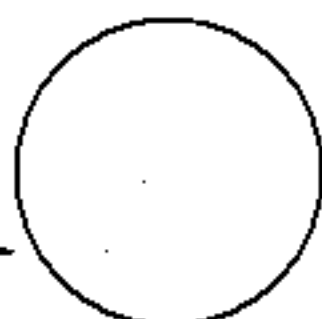
影片的创作过程，就是我们重新学习、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和艺术观的过程。哪些方面我们的思想跟上去了，从实际出发，按照革命样板戏的革命精神和艺术经验做了，创作上就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哪些方面我们的思想跟不上，在创作上就出现了缺点和不足。如：有些戏处理得还较粗糙，没有细致地表现好发展层次和过程，个别情节推敲得不够严谨；冬子的个别语言不象孩子的话。特别是对母亲牺牲的处理，调子不够高昂，更是明显地暴露了我们的弱点。由于我们对英雄人物理解不深，把握不准，只是在从容就义的“从容”上做文章，没有着力刻画她生命不止、战斗不息的英勇斗争精神，以致这一英雄形象受到了削弱。脱离开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性格特征去片面地追求人物的“从容”，正是我们对革命样板戏学习不够的表现，也是旧的文艺思想在新的创作实践中的反映。上述这些缺陷，凡能弥补的已在补拍，但它的深刻教训，使我们深深认识到，电影艺术革命的进程中必然充满着两种文艺思想的斗争。只有按照毛主席的教导，通过长期深入工农兵斗争生活，与工农兵相结合，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在革命文艺创作的实践中，坚持不懈地改造世界观、艺术观，才能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拍出更好更多的革命电影来。

我们愿象影片的主人公小冬子一样，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努力学习，继续作战，在银幕上为无产阶级争光，为无产阶级电影艺术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



小厂也能造出四百吨大平板车

河北沧州市交通局四〇〇小组



编者按：看了这篇讲辩证法的材料，令人鼓舞。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人民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也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中国工人阶级和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创造性正在源源不绝地涌现出来。“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难道事实不正是和将是这样的吗？

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在各地许多单位的支援下，我们沧州市自行设计、制造成功了我国第一辆四百吨大型公路平板车。这辆车包括五百马力牵引车和平板车两部分，全长三十三米，宽三点八米，高三点四五米，有一百一十六个轮子，自重达一百三十六吨。通过多次空车、满负荷道路试车，各部运转正常、性能良好。经有关部门鉴定批准，已交付使用，投入生产。

四百吨大平板车的制造过程，是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的过程，是唯物论战胜唯心论、辩证法战胜形而上学的过程。

沧州市，城市小，只有十四万人，没有什么大工厂，全是些小厂小社，机器设备、技术条件都比较差。靠这样的“小家当”能不能造这样大的平板车呢？有人认为，小厂小社搞这样的大平板车是“门不当，户不对”。厂小车大，一小一大，这确实是个矛盾。但是，“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大和小是相比较而言的，世界



上没有绝对的大，也没有绝对的小。大中有小，小中有大。在一定的条件下，大和小可以转化。沧州市虽然不大，但把小厂小社算在一起，也有七十多个，两万多工人。设备虽然不多，但全市的机械设备集合起来，也有三千来台。就单个看，一个小厂小社确实人少、设备单，但开展社会主义协作，把这些小厂小社的人力物力都集合起来，这个力量不就很大了吗？大平板车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但同一切庞然大物都是可分的一样，它也是可分的。大平板车是由两万多个部件组成的，每一个部件比起整个车来，那就小得多了。如果全市搞会战，小厂小社一齐上，三千来个“小蚂蚁”，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去啃大平板车这块“大骨头”，那就没有什么啃不动的。

小厂小社，作用不小。文化大革命以来，沧州市通过小厂小社的团结协作，搞出了技术条件要求较高的单晶硅和大型轧延机，实现了小型化肥厂半年设计并建成投产，六千瓩发电机组当年设计、当年施工、当年投产的高速度。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更加高涨，为什么就不能依靠我们的小厂小社把大平板车造出来呢？广大群众说得好：厂小不要紧，车大不可怕，团结起来力量大，大小就转化。他们在战略上以小攻大，即以小厂小社攻整个大平板车；在战术上则是以大攻小，即一大批小厂小社的人力设备攻一个或几个部件。就这样，经过全市工交战线包括社办、街办、队办、校办工厂的积极努力，仅花了九十九天的时间，就把这个大平板车造出来了。

造这样大的平板车，我国还是第一次，没有现成的图纸，要靠自己搞设计。可是全市没有一个汽车制造专业的技术人员，机械行业的技术人员也不多。怎么办？我们就发动群众和现有技术人员来搞。参加“三结合”设计小组的大都是工人群众，包括近几年入厂的青年工人。靠这些人能不能设计这样大型复杂的车辆呢？有的人说：“要解决这项技术复杂的设计问题，没有几个‘大人物’算是不好办。”言外之意，就是说工人群众缺乏技术知识，解决不了问题。这种看法对吗？不对！有没有知识，知识的多少，技术的高低，是相对的，可变的。实践出真知。科学技术知识都是实践经验的总结。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在实践中用心学习，注意总结经验，无知可以变有知，知之不多可以变成知之较多。不



仅如此，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广大工人群众处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这就是设计大平板车的技术基础。广大工人群众，很少受那些不切合实际的条条框框的束缚，敢想、敢干，有不怕挫折的顽强精神。只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把他们的智慧、经验集中起来，就能够创造出为资产阶级的“大人物”所预料不到的奇迹。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群众批判了林彪鼓吹的“天才论”、“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进一步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更加坚定了信心，积极投入了设计工作。他们说，脱离人民的“上智”最“愚”，在正确路线指引下的“下愚”最“智”，我们就是要靠自己的力量设计出符合要求的大平板车来。广大职工人人献计献策，个个为设计大平板车出主意、想办法。直接参加设计的汽车司机、汽车修理工、木工、装卸工和技术员、干部，根据他们各自不同的经历和听到、看到的各种车辆的特点，构思着大平板车的雏型，有的做模型，有的在院子里画“地图”。他们说：“大平板车再大也大不过地球，咱早晚会把它比划出来。”三结合设计小组的同志们，集中了大家的意见，并根据多次到外地参观、学习的经验，主要参考上海三百吨大平板车设计图纸，选用十多种国内定型车辆的结构，经过科学地分析、归纳，有机地综合统一起来，经过上千次的修改，终于作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设计方案。

工人们搞设计，敢于冲破洋框框，克服前进中的种种困难。设计制造大平板车的轮胎就是突出的一例。大平板车的轮胎按设计要求，规格与普通解放牌汽车的轮胎一样大小，但负荷却要由一点五五吨增加到五吨。国内还没有造这种轮胎的先例。红旗橡胶厂的工人和技术员，根据他们多年翻修各种轮胎的经验，用唯物辩证法作指导，提出了通过增大内压、增加帘子布层数来增大负荷的设计方案。有人认为这样会使胎壁增厚，胎囊缩小，抵消增大内压的作用；还有人用“违反国际资料规定”为理由否定这一方案。然而，工人们坚持试验，反复修改，改用新材料，采取新工艺，使其增层而基本不增厚，终于制成了大平板车的这种轮胎。经有关部门鉴定，质量完全合格。这个事实有力证明，掌握了自己命运的工人群众，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能够用辩证法冲破洋框框的束缚，把前人



没有做过的事做出来。

有了图纸，要把它变成车辆，这里还要解决许多矛盾。比如，加工一些大的部件，一般需要有比较大型的精密度较高的设备。可是小厂小社里只有一些小设备、小机器。怎么办？我们还是通过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来解决问题。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着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工人们就是按照这个道理，解决了大部件和小设备之间的矛盾。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不但大平板车可分为若干部件，大平板车的每一个部件也都是可分的。把大部件看成由若干部分组成，以小设备的整体，对大部件的一个局部，这样，小设备相对地变大了，大部件则相对地变小了。工人们就是采取这种将大化小、分割歼灭的办法，用小设备一部分一部分地进行加工。大平板车的副梁，长一百二十厘米，重八百多公斤。加工副梁需要大刨床。承担副梁加工任务的交通局运输一队，只有一台小牛头刨，只能加工长六十五厘米以内的部件。工人们就分三段加工，先在中段刨出退刀槽，再刨一头，以前一头作基准找正找平，再加工另一头。这样，牛头刨床虽小，但面对着副梁的三分之一就相对地变大了，加工起来就占了优势。同样是用这种办法，在半米的镀槽里镀出了近一米的转向油缸；用小千斤顶代替了大型压力机，完成了牵引车大梁的校正任务。

在一定条件下，大可以化小，小也可以变大。大设备所以能够加工大部件，是因为它具有加工大部件的性能。能不能叫小设备也具有大设备的性能呢？工人说得好：“机器是人造的，机器的性能也是人给的，在小设备上闹革命，搞革新，小设备就能长能耐，干出大设备所能干的活来。”我们发动群众大搞技术革新，实现了近百项小改小革，提高了现有小设备的能力，使小设备完成了一个个大件加工任务。平板车的转向油缸和悬挂油缸，都是较大的部件，按规定必须用大型立式搪床搪孔，没有这种大型搪床，农机修理厂的工人就在一台小车床上搞革新。他们改装了车头，做了工卡具，终于以小攻大完成了这两种部件的搪孔任务。运输一队的工人们在小皮带车床上搞革新，代替了大型座标搪床，完成了牵引车内、外半轴的加工任务。工人们说：“技术革新威力大，小设备一革新，就敢同大设备比高低。”



要使小的东西发挥大的作用,关键在于发挥广大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比如说,每节重达二十五吨的车架,要由主梁和五百三十多块不同形状的钢板焊接成,完成这道工序要求较大的厂房和二十五吨以上的大型吊车或大天车。可是总装车间是个大席棚,没有大天车,全市也没有大吊车。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工人们七嘴八舌,大家出主意,想办法,终于找到了一个土办法。他们先在车架两头正中各焊上一根轴,又做了两个支撑架,用五吨的小导链组成小导链群把车架吊起来,放在两个支撑架上,这样,车架就象大风车一样悬在空中,用手一推就可以随意翻转,焊接非常方便。一个去参观的工程师赞叹地说:“这个办法太好了!在洋本本上是找不到的,坐在办公楼里是想不出来的,只有群众的智慧才能放出这样的光彩!”

有些人看不起土办法,认为土办法搞简单东西、干粗拉活行,技术性强、结构复杂、质量要求高的活,土打土闹不行。其实,土办法虽“土”,但它并不粗,并不落后,它是来自群众实践的办法,包含着丰富的科学内容,因而也是多快好省的办法,照样可以攻克技术上的难关。平板车的主梁,是车的脊梁骨,是由锰钢板焊成,焊成后的弯曲度不能超过千分之一。这是一个技术上的难关。按要求,要有一套自动焊接设备和严格的焊接工艺才行。工人们说:我们就不信用土办法拿不下这个“千分之一”。他们集中集体的智慧,拿出了一套土办法:为防止整体变形,实行对角焊,连续焊;为防止局部变形,根据钢板受热而内应力集中、内应力一集中就出现变形的道理,焊接时边焊边浇冷水,防止钢板内应力集中,并结合采用了焊哪里就在哪里用铁卡子强行固定的办法。结果,焊接出的主梁弯曲度仅千分之零点三,超过了原设计的要求。

所谓“土”和“洋”,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没有“土”就没有“洋”。洋办法是土办法的继续和发展。不从“土”开始,坐等求“洋”,那就会被“洋”缠住自己的脑袋和手脚,什么东西也干不成。任何事物都是从较低级向较高级发展的。土法上马,“土”“洋”结合,从“土”到“洋”,这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方针区别于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一个特点,也是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四百吨大型平板车的制造成功,就是一个生动的说明。



在两条道路斗争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大队党支部

内容提要：农村党组织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抓紧两条道路斗争，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经常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并在斗争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这样，才能不断巩固、扩大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发展、壮大人民公社集体经济。

我们小靳庄大队有一百零一户，五百八十二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党支部的路线不对头，一度成为“老大难”单位。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和锻炼，我们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抓紧了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提高了党员、干部和群众的路线斗争觉悟，使大队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以来，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更使我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教育。几个月来，革命、生产又取得了新的成绩，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普及、深入、持久地发展，党员和群众在斗争中进一步受到锻炼，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新人新事新气象不断涌现。革命推动了生产的发展，粮食平均亩产去年达到五百五十斤，比文化大革命前翻了两番，今年又增加到八百二十斤。

小靳庄的面貌为什么近几年会发生这样大的变化？我们体会最深的一点就是，党支部要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抓紧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是有深刻教训的。文化大革命前，党支部五名委员都是贫下中农，他们也有搞好工作的愿望，但是由于路线觉悟不高，受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错误地认为阶级敌人被我们打倒了，地主、富农“老实”了，因此不抓路线，不抓阶级斗争，把党支部变成了单纯抓生产的班子。路线不对头，造成资本主义倾向泛滥，阶级敌人乘机兴风作浪，散布“四旧”，腐蚀人们的思想，使



集体经济受到了削弱，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了挫伤。

新的党支部委员会产生以后，摆在面前的一个尖锐问题就是，要改变小靳庄的落后面貌，究竟抓什么，应该怎么抓？我们联系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训，认真学习了党的基本路线，进一步认识到，农村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是很激烈的。农村党支部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认真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领导党内外群众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不断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如果忘记了这个根本任务，就会偏离正确方向，不仅生产抓不上去，还会滑到资本主义邪路上去。

几年来，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的教导，联系我们大队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实际，反复向党员、群众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发动群众进行新旧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比，进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对比。小靳庄在解放前，是一个苦难深重的佃户村，这里是“九河下梢，十年九涝”。人民过着悲惨的生活。一九三九年闹大水，颗粒没收，全庄外出逃荒一百五十多人，连病带饿而死的有六十多人。全村贫下中农，都有一部“糠菜团子泪水煮”的悲惨家史。我们先后五次发动贫下中农，大讲村史、家史，忆苦思甜，激发大家的阶级感情，并联系实际揭露资本主义倾向，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经过基本路线教育，贫下中农更加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立下了改变小靳庄落后面貌的雄心壮志。我们就带领社员群众，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大干社会主义。小靳庄原是一片盐碱地，为了改造土壤，挖河泥垫地，一九七一年我们提出了“河挖三尺，地长一寸”的战斗口号。经过三年奋战，改良了土壤，粮食生产大翻身，年年跨过《纲要》。在战天斗地的过程中，群众的革命热情非常感人。一九七二年遇到了旱灾，广大社员担水抗旱，四十天扁担不离肩。我们又一次体会到，地靠人变，人靠路线。路线对了头，群众当中蕴藏着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能够充分调动起来，困难再大，也能克服，条件再差，也能改变。

两条道路的斗争，表现在农村工作的各个方面。党组织要带领社员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引导群众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我们经常抓住现实生活中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问题，发动社员群众开展大讨论，进行路线教育，使大家明辨是非，划清界限。有一次，我们大队给国家加工苇席，任务完成后，剩下的苇子又织了二十领席，当时有人主张拿到自由市场高价出售。党支部认为，是高价出售，还是卖给国家，这不单是多卖或少卖几个钱的问题，而是反映了两条



道路的斗争。我们把这个问题交给群众进行分析讨论。经过讨论，广大贫下中农坚决不同意高价出售，他们说：“我们要走社会主义光明大道，不能搞资本主义的歪门邪道”。结果把这部分席子交售给国家了。我们感到，群众掌握了党的基本路线，就能从根本上分清两条道路的是非界限，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抵制资本主义倾向，一些歪门邪道就没有市场。现在，在我们小靳庄，爱国家、爱集体的社会主义正气大大发扬，资本主义成了过街老鼠，谁要想搞资本主义，不仅在生产队里行不通，甚至连自己的家门也出不去。

两条道路的斗争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而且突出地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文化大革命以前，在我们大队思想文化阵地上，封、资、修的黑货还有很深的影响，一些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和孔孟之道的坏书、坏戏、坏故事流传很广，毒害着人们的思想。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小靳庄过去所以成为“老大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剥削阶级利用“四旧”拉拢腐蚀干部，毒害人们的灵魂，破坏集体经济。我们只有从各个角落不断清除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展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才能巩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才能发展。提高认识以后，几年来，我们带领社员群众，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同资产阶级展开了交锋，对腐蚀人们的剥削阶级反动思想和反动文化进行了反复的批判。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开展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锐利武器。从一九七一年八月份开始，我们开办了政治夜校，以学政治、学理论为主，并把学文化、学军事、学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全大队二百五十多名社员参加了学习。三年来，有四十二人摘掉了文盲帽子，一百九十多人学会了写大批判文章，一百七十多人学会了写革命诗歌，初步建立了一支贫下中农理论队伍。全村看书学习的空气越来越浓。政治夜校成了社员群众学习革命理论的课堂，批判资产阶级的战场，开展革命文化活动的中心。

几年来，我们联系现实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有计划地组织党员和群众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并结合政治运动，学习了毛主席有关批林整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重要指示。通过看书学习，提高了党员、群众的思想理论水平，推动了三大革命运动的开展。一九七二年，庄稼遭了虫害，阶级敌人乘机散布“天命论”，胡说什么“闹虫子是天年”，妄图动摇我们战天斗地的决心。我们就组织社员大学《实践论》，批判唯心论的“天命论”，树立了实践第一，人定胜天的思想。大家说：“我们不信天命，要



革命。”社员群众积极行动起来，三天的时间，就从玉米秸里剥出了四十多斤钻心虫，使农作物基本上免除了虫害，保证了农业的丰收。

在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的同时，我们发动群众大唱革命样板戏，成立业余文艺宣传队，创作革命诗歌，开办图书室，讲革命故事，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移风易俗，破旧立新，用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文化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现在，全村大人小孩大多数都会唱革命样板戏选段。群众性的文艺宣传队，利用业余时间，自编自演反映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的文艺节目，宣传毛泽东思想，表彰新人新事。全村有一百多人经常参加诗歌创作活动，不到一年工夫，就写出了一千四百余首战斗的诗歌。批林批孔运动中，社员们以诗作武器，批判林彪和孔孟之道。批判了过去流传的坏书，社员群众集中了几百册革命书籍，开办了图书室，并广泛开展讲革命故事的活动。场院、地边、饲养室、炕头上，都成了讲革命故事的场所。过去，在我们大队，订婚要彩礼，结婚讲排场，治病请巫婆，死了人看坟地，男尊女卑等旧风俗、旧习惯的流毒很深。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组织党员和群众批判了浸透孔孟之道毒素的《三字经》、《女儿三字经》和反动谚语，批判了孔老二和林彪诬蔑劳动妇女，宣扬封建礼教的罪行，破旧俗立新风。全大队有十二个姑娘主动把彩礼退回婆家；有二十三名订婚青年，响应党的晚婚号召，推迟了婚期；一百余名有生育能力的已婚社员订了节育计划。男女同工同酬的政策得到了落实。现在，订婚不要彩礼，结婚不讲排场，讲科学，破迷信，遇灾害病不求神，村里死了人开追悼会，实行火葬，社会主义新风尚正在形成。

“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当我们放松政治思想工作，忽视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时候，封、资、修的反动思想文化就泛滥，社会主义经济就遭到破坏，各项工作就搞不好。反之，当我们注意了政治思想工作，重视了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时候，政治思想战线就生动活泼，新人新事新风尚就不断涌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就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革命和生产就得到顺利发展。正如社员群众说的：“可别小看了唱戏，唱啥学啥，听啥学啥。过去唱那些坏戏，都是教人想升官发财，剥削别人，受了这个害，那还不去搞资本主义歪的斜的？如今唱英雄，学英雄，越唱越听心越红，干社会主义的劲头就更足了。”

集体经济中两条道路的斗争，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一定会反映到领导班子中来。有什么样的领导班子，就会带领群众走什么样的道路。斗争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而坚强的领导班子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形成。

毛主席教导我们：“**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要带领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党支部就必须首先解决好路线问题。新的支委会成立后，就



如何改变小靳庄落后面貌的问题，在领导班子内部曾出现过不同看法，有个别委员认为，要改变落后面貌，就要狠抓副业，社员的工分值每天搞到一元五，积极性就会调动起来。当时，我们就以改变小靳庄的落后面貌靠什么为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批判刘少奇“物质刺激”、“工分挂帅”的修正主义黑货，批判重副轻农的错误思想。一些老支部委员深有感触地说：“跌过跤的道记得最清，亲身经历的错误印象最深。我们过去走过的错误道路坚决不能再走。”经过讨论，一致认为，要改变小靳庄的落后面貌，就要靠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干部、群众的头脑，抓革命，促生产。以后我们就比较自觉地注意了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比较地注意了抓好党支部领导成员的路线教育。

毛主席教导我们：“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从实践中体会到：斗争需要团结，团结是为了战斗，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搞好革命团结的基础。根据我们以往的教训，我们在加强团结上特别注意了这样几个问题：一是认真看书学习，不断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树立立党为公的思想，要求支部领导成员关心政治，关心大事，关心集体。二是坚持斗争哲学，不搞“中庸之道”，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支部领导成员经常检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是不是符合党的原则，是不是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不是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经常围绕着这些大是大非问题，进行整风学习，开展谈心活动，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随时纠正偏离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上。三是注意团结犯过错误的同志一道工作。新的支委会是老、中、青三结合的班子。七名委员中，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两名，女同志一名，还包括了原来的三名委员，其中有原支部书记和大队长。新、老干部都注意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努力在斗争中形成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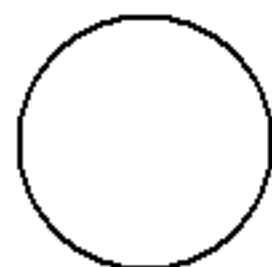
要带领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党支部就要有艰苦奋斗的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新的支委会成立以后，明确提出：凡是要求党内外群众做到的，支部委员要首先做到，要真正成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带头人。几年来，支部领导成员每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都在三百天以上。我们不仅要求干部带头，而且教育干部的家属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支持干部搞好工作。党支部领导成员注意以身作则，密切联系群众，接受群众监督，经常召开贫下中农座谈会，逢年过节都要进行家访，关心群众的疾苦，征求群众的意见，努力做到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

我们决心继续努力抓好批林批孔，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好得很

中国共产党辉县委员会



我们县位于太行山的东南部，山区、丘陵面积占百分之七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我县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劈山治水，改土造田，使全县的面貌发生了比较显著的变化。过去，辉县是个“山秃水缺土层薄”的穷地方，现在，山区初步实现了通水，通电，通公路；水浇地达到一人一亩，修了二十七万亩大寨田，在乱石滩上造了两万七千亩良田，对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耕地进行了平整。去年，粮食亩产六百五十斤，比一九六五年增加了一点五倍。今年又战胜了几十年没有的大旱，小麦亩产一季跨过《纲要》。集体储备粮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增加了二十倍，社员生活水平逐年提高。

我们县这几年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变化？我们体会，根本原因是路线对头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排除了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执行，这是发展生产、改变面貌的根本原因。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县的干部在广大群众的监督和帮助下，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密切了干群关系，使领导思想比较符合辉县的实际情况，这对充分调动蕴藏在广大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起了重要的作用。

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通过这几年的实践，我们对这一点有了进一步的体会。党的路线是通过干部贯彻执行的。



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干部能不能经常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能不能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关系很大。有了正确的路线，会产生好的作风；有了好的作风，才能贯彻执行正确的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县委也订过改变辉县面貌的规划，但是，实现不了，只是说在嘴上，写在纸上。这主要是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刘少奇一伙极力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说什么国家干部是“脱产干部”，不劳动理所当然。结果，就造成一些干部高高在上，不深入群众，怕艰苦，不劳动。那怎么能改变面貌？文化大革命中，在群众的帮助下，广大干部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了剥削阶级轻视劳动的传统观念，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以新的姿态和革命化的作风，走上了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和群众共同劳动，共同战斗。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进一步密切了干群关系，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全县革命和生产的形势越来越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育了我们，使我们认识到干部是不是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确实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广大干部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是否坚持继续革命的一个大问题。刘少奇、林彪一伙破坏我们党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破坏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攻击干部参加劳动是“变相劳改”，目的是用修正主义思想腐蚀我们的干部队伍，推行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对此，我们必须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时刻保持警惕。

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这里存在着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有人说：“联系群众不一定到基层，更不一定参加劳动”，就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我们在实践中体会到，如果干部长期脱离劳动，就会与劳动人民没有共同的实践，没有共同的感情和语言，就会失去劳动人民的本色，就会慢慢变质，滑到修正主义邪路上去。因此，我们县委这几年来，一直坚持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定出制度，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从县委书记到其他领导干部，都经常深入基层，走到那里，劳动到那里。六年以来，第一书记每年平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百一十天，县委常委九十六天，公社干部一百七十五天，大队干部二百六十五天。由于经常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广大干部就能够和劳动人民共命运，同呼吸，团结战斗，站



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前列，带领群众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能够更好地抓住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个纲，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促进农业大干快上。过去，我们虽然也知道社会主义时期存在阶级斗争，口头上也说要抓阶级斗争，但农村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如何，特点是什么，并不十分清楚。全县曾经有六十多个比较后进的大队，生产长期上不去。对有一些队派去工作组，几进几出，也没有解决问题。有人认为：“这些队群众落后，条件差，面貌难改变”。后来，我们就下决心亲自到一个比较后进的大队蹲点。首先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在田间、地头、饭场、牛棚和贫下中农广泛接触，了解情况。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这个大队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主要干部被阶级敌人腐蚀，致使资本主义泛滥，集体经济受到破坏。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就大张旗鼓地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群众，发动群众，打击隐藏的阶级敌人，教育挽救犯错误的干部，很快地刹住了资本主义歪风，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干部和社员^①的积极性。这个大队，干部和群众团结战斗，花了两三年的时间就修建了三个蓄水池和八千多米石砌渠道，基本上实现了水利化，使粮食亩产由一百多斤上升到七百多斤。县委推广了这个大队的经验，全县六十多个比较后进的大队也相继改变了面貌。斗争实践使我们体会到，农村的阶级斗争是十分复杂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领导干部只有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亲自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取得阶级斗争的主动权。

农村这个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然去占领。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表现十分激烈。我们要掌握这一斗争的特点和规律，因势利导，夺取胜利，也非深入基层，参加劳动不可。去年冬天，在农田基本建设的高潮中，有个大队出勤的劳动力突然减少了，忙着盖房占宅基地的人突然增多起来。什么原因呢？在这个大队参加劳动的公社党委书记很快了解到，原来是外地来了个“算命先生”，散布什么“属土命的不能破土，破土必有大灾大难”，“新媳妇要住新盖的房，才能富贵荣华”，造谣惑众。公社党委抓住这件事，借批林批孔运动的强劲东风，发动群众，狠批了孔老二的“天命论”和“男尊女卑”的反动观点，使广大干部、群众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大家说：“不信天命干革命，妇女能顶半边天”。他们大干一百天，劈开半座山，造出百亩田。在这以后，我们



还批判了流毒较广的《三字经》、《女儿经》和一些反动谚语，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用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占领整个农村阵地，从而促进了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深入发展。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有助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集中群众智慧，依靠群众力量，开展改造自然的斗争。以前，一提起治水造田，一些人总是说，这里条件差，那里有困难，一年又一年过去了，仍然在穷山恶水面前发愁。后来，我们到拍石头公社参加劳动，请教一位老贫农能不能治水造地。这位老贫农说：“过去单干时，村村户户的土地都以河心为界，你造田他不许，他造田你不许，结果谁也造不成，河身越冲越宽。现在有了人民公社，大家一股劲儿，一定能治住洪水，造出好田”。老贫农的话反映了广大贫下中农治水造田的强烈愿望，也说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巨大优越性，使我们心里亮堂了，进一步看到了蕴藏在群众中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认识到“守老摊子不叫革命”，必须振奋革命精神，带领群众大干。县社干部带领群众大战两个冬春，在乱石滚滚的郊东沟里造出了三千亩良田。群众促干部，干部带群众，越干越想干，越干越敢干，越干越干得好。接着，我们又带领万名造田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名叫“洪洲城”的一片乱石滩，在滩上造了一万多亩“东西南北一展平，上盖一米活土层”的大寨田。事实教育了我们，过去的所谓“难”，就是眼里没有群众。人民群众有无穷的智慧和力量。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一旦发挥出来，就能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使过去不敢想的事也可以办到，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在治山治水造田的斗争中，我们是先当学生，后当先生，不断总结和推广群众的经验，蓄住天上水，挖出地下水，截住潜流水，引出沟泉水，提水上山岗，因地制宜，小型多样，小水巧管，滴水归田，并且形成一套“由上至下，层层筑坝，节节拦洪，搬石运土，河滩造田”的办法，既蓄住了洪水，又扩大了耕地。几年来，在战胜干旱，夺取丰收的斗争中，这些工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可以深入调查研究，正确地认识人和自然的关系，逐步掌握自然规律，取得带领群众征服自然的主动权。过去，我们多数同志虽然生长在辉县，并没有真正认识辉县。有的人说：“辉县山区多，底子薄，要大变、快变办不到”。辉县的面貌到底能不能大变、快变、彻底变？毛主席说：“你对



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在参加劈山治水、改土造田的斗争中，背着行李，带着劳动工具，爬高山，走险路，边劳动，边访问，看地形，查水源，先后进行了四次大调查，走遍了全县的山川，访问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队，广泛听取了贫下中农的意见，得到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对辉县的自然面貌才逐渐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同时，也看到了广大群众改天换地的力量。思想路线对头，对辉县的看法也就不一样了。过去只看到穷山恶水困难大，看不到条件能转化。现在，看到山区有山区的好处：建水库有山沟，修水渠有石头，造水泥有原料，劈山造田有空间，只要领着群众干，辉县面貌定能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制定了重新安排河山的规划，也有了实现规划的信心。全县实现水利化，需要修建四个中型水库，我们计划四年建成，五年配套，当年见效。当时有人说：“四年不要说建四个了，连一个也搞不成”。到底行不行，实践来验证。今年我们已经建成了第一个水库，并且为明年修建第二个水库备好了百分之七十的材料。这个事实，有力地批判了唯心论的先验论，驳倒了各种各样的悲观论调和懒汉懦夫思想，证明我们的规划是比较符合实际的，是切实可行的。同时，使我们深切感到，领导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不能象小农经济那样只限于修修补补，应该树立雄心壮志，敢于拿出一个从根本上改变自然面貌的积极可靠的规划。而要有一个积极可靠的规划，并且领导群众逐步实现这个规划，各级领导干部就必须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经常深入群众，认真进行调查研究，正确认识社会，认识自然，善于集中群众的意见，形成正确的领导思想。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县直机关没有修建楼、堂、馆、所。有的公社至今没有新建一间办公室，他们说：“粮食不上纲，公社不盖房。”资金绝大部分用在水利建设方面了。我们一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继续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争取为彻底改变辉县面貌，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注意总结实践经验 办好社会主义农业

争取社会主义农业的更大发展

赵 丰 年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我国亿万农民意气风发学大寨，战胜各种自然灾害，夺得了又一个丰收年。

今年是我国农业连续第十三年丰收。粮食总产量在去年丰收的基础上又达到了新的水平；棉、油、麻等经济作物收成很好，林、牧、副、渔各业都有了新发展。全国大寨式的县、社、队越来越多。低产变高产、高产更高产的地区大量涌现。黄河以北出现了一批亩产过“长江”的县；长江以南出现了亩产超千斤的省，以及亩产一千六百斤以上的县。北方历来多灾缺粮的冀、鲁、豫三省，实现粮食自给有余，为扭转南粮北调作出了新贡献。西北黄土高原一些省、区，奋发图强，夺得了较大幅度的增产。特别令人振奋的是，地处“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今年也实现了全区粮食自给，粮食总产量比丰收的一九七三年增长百分之十五以上，还出现了小麦亩产千斤以上的高产纪录。我国广大农村，从南方到北方，从内地到边疆，到处是一派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丰收，不仅保证了全国人民丰衣足食，增加了国家、集体和社员群众的粮食储备，而且促进了工业、交通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进一步加强了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这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农业减产、人民生活不断下降的状况，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个事实再次雄辩地证明了“革命加生产即能



解决吃饭问题”这一真理；同时，也给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经济建设的污蔑以有力的回击。

现在，我国农业战线的形势是大好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广大干部、群众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社会主义积极性进一步高涨，农业学大寨运动蓬勃发展，开展了规模壮阔的改造山河的斗争。历史上为害最大的黄河、淮河、海河初步得到了治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三亿二千万亩易涝农田大多数得到了初步改造；农田基本建设的规模一年比一年大，灌溉面积不断增长；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广泛开展；农业机械化水平有了提高。所有这些都为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创造了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我们应当努力学习毛主席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发展农村大好形势，争取社会主义农业的更大发展。

今年的农业丰收又一次证明了，发展农业的根本问题在于路线。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紧抓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一条最基本的经验。**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二十几年来，我国农业所以能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最主要的就是因为，我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抓住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个纲，在农村开展了土改、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等一系列伟大的政治运动，改造了所有制，建立、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并不断扫除上层建筑领域中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束缚农业生产发展的障碍，使我国农业走上并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为了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毛主席为我们规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这就从根本上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在自然灾害的袭击中，不断发展。

在农村，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始终是围绕着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问题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



线,为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扫除了障碍。但是,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依然存在。我们要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就必须继续不断地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发展农业要抓路线,学大寨要讲路线,这不仅过去、现在是对的,而且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是对的。大寨,是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榜样。大寨的干部、群众坚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和阶级敌人斗,和修正主义路线斗,和资本主义倾向斗,和各种错误思想斗,使人变地变产量变,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近几年来,全国各地在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了大批学大寨、抓路线、迅速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单位,这些单位大都经历了一个对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从不自觉到比较自觉,对大寨根本经验从不认识到比较认识的过程。他们的共同经验是:面貌变不变,根本在路线。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革命就前进,生产就发展,集体经济就巩固壮大;离开党的基本路线,不抓革命,不抓阶级斗争,不但生产上不去,还会走到资本主义邪路上去。

今年以来深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是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新的强大动力。批林批孔运动,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在农村,批林批孔运动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结合在一起,正在进一步解决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广大干部、群众通过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实际,深入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许多地方在革命大批判中,还联系和回顾农业发展的过程,紧紧围绕农村中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中心,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着重从路线上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进一步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巩固和扩大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

要进一步发展农业战线的大好形势,就必须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保证农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我国农业的连年丰收还证明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方针的完全正



确。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个方针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同志所理解，各级领导贯彻执行这个方针的自觉性也越来越高。因此，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大办农业，各行各业支援农业，这是我国农业取得连续十三年丰收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全国来看是如此，从一个地区来看也是这样。冀、鲁、豫三省近年来农业以及工业发展较快，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坚持把发展农业放在首位。省、地、县各级党委切实加强对农业的领导，派出大批干部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把地方机动财力的大部分用于发展农业，组织工业和各行各业大力支援农业。几年来，这三个省围绕农业新发展了一千多个“五小”工业，为加速农业机械化创造了条件。有的省，如湖南一九七〇年以来，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全省工业部门积极协作，为农业提供化肥设备，自制合成氨设备六十六套，建成八十七个氮肥厂，磷肥厂由九个增加到三十二个，磷肥产量跃居全国首位，对农业持续增产起了作用。农业的发展，为国家提供了更多的商品粮、副食品和工业原料，为工业产品开辟了广阔的市场，反过来又促进了钢铁、煤炭、化肥、机械等工业的迅速发展。这些事实又一次证明，工业和农业是互相促进的，对于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现代化，绝不应当分割开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农业发展了，全国人民都高兴，各项工作都主动，也必将为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加坚实的基础。工业发展了，可以进一步支援农业，使社会主义农业得到更快的发展。

“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科学地阐明了农业和工业以及其他各行各业的辩证关系，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针。多年来的经验证明，在各项建设事业中，能不能从这个全局出发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关键还在于提高各级领导的自觉性。有的地方口头上也讲要把发展农业放在首位，但是在行动中却往往没有这样做。有的甚至挪用支援农业的资金、材料，这不仅影响农业的发展，而且反过来影响工业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要牢固地树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真正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工作。同时反对各种铺张浪费的资产阶级作风，象昔阳以及其他许多学大寨的先进地区那样，勤俭节约，艰苦创业。



在加强和发展农业的过程中，各级干部进一步发扬了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工作作风，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普遍加强了调查研究工作，这是批林批孔的成果之一。深入批判了林彪、孔老二“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反动谬论，各级干部到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去的自觉性更高。各地都有大批干部到基层蹲点，参加劳动，帮助工作。事实证明，要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开展三大革命运动，改变一个地方的农业面貌，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干劲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是办不到的。“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这是许多先进单位的共同体会。要搞好批林批孔，解决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就要深入到群众中去，调查和分析当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历史和现状；要治山治水，改造山河，就要和群众一起，深入实际，摸清情况，制订切合实际的规划，并带领群众干；要抓好典型、面上的工作先抓好三分之一，就要真正在群众中蹲下来，亲身参加到群众斗争的实践中去。这样才能避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掌握领导革命和生产的主动权。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干部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势必脱离广大的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对这个问题，各级干部获得了更深刻的体会。身不离劳动，就能心不离群众，和群众保持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就能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各级领导机关要实行精兵简政，精简会议，克服“五多”，使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成为一项经常性的制度。这也是加强农业生产的领导，办好社会主义农业的一个重要问题。

加速发展农业，是落实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伟大指示的重要方面，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也是广大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共同心愿。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一个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正在兴起。“领导一定要走在运动的前面，不要落在它的后面。”各级领导同志要使自己的思想及时跟上形势，鼓足干劲，积极地、热情地带领群众前进，努力争取社会主义农业的更大发展。



总结抗旱经验 促进农业发展

贺建农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农业战线同其他战线一样，形势一派大好。在批林批孔运动推动下，“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深入发展，农业生产在连续十二年丰收的基础上，今年又获得了丰收。在发展农业生产过程中，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同时还经常遇到各种自然灾害的袭击，特别是干旱，历来是我国北方农业生产的大威胁。广大农村群众、干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运用唯物辩证法，同大自然斗，同阶级敌人和修正主义路线斗，同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斗，取得了抗旱斗争的伟大胜利。

广大群众抗旱斗争的实践，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唯物辩证法。认真总结这些经验，从中找出规律性的认识，对于进一步搞好农田基本建设，加快农业发展的步伐，是有重要意义的。

我国北方地处昆仑、祁连、秦岭、大别山系以北，因山阻雨，年降水量少而不均。据历史资料记载，解放前的五百八十一年间，河北省就发生旱灾四百零七次；另据一九一二年到一九四八年旱灾季节资料的分析，春旱约占百分之六十三，春夏连旱约占百分之二十三点七。解放后二十五年来，也经常遇到干旱。

干旱是一种自然现象。但是，对待干旱这种自然灾害的态度，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的思想政治路线，则是根本不同的。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总是极力鼓吹儒家唯心论的“天命论”，把自然灾害说成是“天意”。一遇水旱灾害，就搞什么求雨、卜筮的把戏，借以愚弄、剥削人民，使生产为遭到破坏。主张革新、进步的法家和儒家针锋相对，以朴素的唯物论反对“天命论”。荀况就曾经提出过“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思想。但是，由于生产水平和阶级的局限，法家不可能对“天”作出科学的解释，也不可能认识劳动人民是“制天命而用之”的主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指明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大自然的主人，并用唯物辩证法指导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干旱也是如此。要认识和战胜干旱，就要从本质上，战略上，把它看成是纸老虎，藐视它，敢于同它作斗争；在战术上，又要把它看成是真老虎，重视它，努力创造条件，促使它由真老虎向纸老虎转化，战而胜之。解放后，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人民群众不信天命干革命，同自然灾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广大群众、干部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坚持“农业学大寨”，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抗旱斗争不断取得新的胜利。河北省一九二〇年和一九七二年都遇到了特大干旱。但是两个社会两重天。一九二〇年有九十七个县的耕地不能播种，赤地千里，饿殍遍野。一九七二年有的地区连续十个月没下透雨，干旱程度和范围都超过一九二〇年，但是广大群众和干部在毛主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同干旱进行顽强的斗争，大旱之年仍然夺得了农业丰收。事实再一次有力地证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只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干旱是完全能够战胜的。

毛主席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是对发展农业生产的经验的科学总结。要战胜干旱，就必须抓住水这个主要矛盾，并正确处理好水和农业其它各方面的关系。

在不平衡中求得相对平衡，充分利用地上水，这是抗旱的一条经验。我国北方总的讲雨水偏少，而且在季节上分布不均。春季降水量只占全年的百分之十左右。但少中又有多，每年汛期，降水又过度集中，约占全年降水量的百分之七、八十以上。过去，大量雨水，特别是降到平原地区的雨水，不能充分拦蓄，白白流入大海。春天缺水干旱，汛期又多水成涝，几乎年年如此。

能不能从降水的不平衡中求得相对平衡，从而改变又旱又涝的局面呢？毛主席教导我们：“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天然降水的多少和降水时机，当前我们还不能人为地加以控制。但是，能不能按照农作物的需水规律，对地上水加以支配和调度，则主要取决于人的因素。最近几年，河北省发动群众，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利用坑塘、深沟等，大搞平原蓄水，千方百计地把地上水蓄起来，秋蓄春用，春旱冬抗，从降水的不平衡中，求得相对平衡。许多



地方改变了春天苦于没水，汛期又生怕水流不走的被动局面，变春季无水为有水，少水为多水，春旱为不旱。这说明，只要我们依靠群众，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能够使有限的客观物质条件得到充分利用，解决好农作物的需水和自然降水在时间上的矛盾，逐步从必然中获得更多的自由。

毛主席说：“小型水利是各县各区各乡和各个合作社都可以办的”。平原蓄水省工、省料、见效快。它除了浇地抗旱，还可以起到排沥除涝，淡化咸水，补充地下水，发展渔、苇生产等作用。但是，有的同志对小坑塘发挥的大作用还不认识，认为一个小坑塘浇不了几亩地，顶不了大用，要解决干旱问题，就要上大工程。这些同志还不完全懂得大与小的辩证关系。没有小就没有大，没有少就没有多，大水是由小水组成的。如果站在一个小的局部，把坑塘一个个孤立起来看，确实很小，但从全局看，发动群众，各地都搞，几万个、几十万个坑塘都蓄上水，它的作用就很大了。在我国北方，由于脱坯盖房、挖土垫圈，差不多村村都有几个大坑，稍加改造就可以用来蓄水。因此，看不起小型水利工程，完全是不对的。

坑塘和水库在蓄水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但它们又各有自己的蓄水特点和规律。坑塘蓄水不能生搬水库那一套蓄水方法，否则要碱化土地。它既要符合蓄水的一般规律，又要适应平原蓄水的特点。坑塘蓄水要分别在汛期、秋季、冬季进行，把水库所不能拦蓄的平原雨水，河道流水，灌溉弃水拦蓄起来。同时，要考虑到同骨干河道、沟渠配套工程相联结，做到能蓄能排，排蓄结合，使水位始终控制在返碱的临界深度以下。这样就可以充分利用地上水，而又避免土地碱化。平原蓄水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注意客观事物之间的联系，又要注意它们之间的区别，既要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又要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当我们已经认识了事物的共同本质以后，就要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深入研究事物的特殊本质，从而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本质的认识，不断发现新事物，总结新经验，创造新方法，提高我们同大自然作斗争的本领。

透过现象抓规律，合理开发地下水，这是战胜干旱的一条重要经验。在我国北方，由于地上水不足，要解决干旱问题，更重要的措施是，积极打井，合理地开发地下水。过去由于形而上学的束缚，有的人把打机井神秘化，看不到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只靠少数专业队伍，不去发动群众，结果打井活动冷冷清清，地下水得不到很好地开发利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形而上学和爬行主义，群众性的打井活动就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现在，许多地方的生产队都能打机井。男



同志能打，女同志也能打。仅河北省的机井就比文化大革命前增长了六倍。群众性打井活动的普遍开展，为合理开发地下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要合理开发地下水，就要深入研究地下水的客观规律。一般地讲，机井多，浇地就多，但不顾客观条件，盲目地认为机井越多越好，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在开发地下水过程中，有的地方就曾出现过一个矛盾，即机井增加很多，浇地面积却增加很少。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没有认识和掌握地下水的运动规律。地下水本来是分层的，各地的储量也不同。但有的地方光打浅井，有的地方光打深井，而且井的平面布局又很密。一个浅、一个深，两者表面看来不同，实质是一样的，即都是集中取了一层水，不符合地下水分层运动的规律。这说明，无论做什么事情，要想取得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必须使自己的思想符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要失败。打井也是一样，要做到合理开发地下水，必须按照地下水的埋藏规律和储量情况，因地制宜地搞好井位和井深的布局。河北省有一个县按照本县地下水的规律，调整了布局，全县机井减少了八百眼，浇地面积反而扩大了四万多亩，单井效益提高了一倍，一眼顶了过去两眼用。

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矛盾。最近几年，深、中、浅层地下水位都出现过下降的趋势。开始，人们用更换提水设备的办法解决这个矛盾，但水位仍然下降。这时有人认为，地下水就要枯竭，再也不能打井了。地下水位的下降是不是意味着水源的枯竭呢？大量提取地下水，是造成水位下降的一个原因，但不会因此而枯竭。因为地下水本身是流动的，不是静止的。它和地上水又是直接联系的，不是孤立的。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近几年来，各地积极开展了群众性的对雨量和地下水动态的观测活动，掌握了天然降水和地下水位变化的大量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人们看到在开发地下水的过程中，年降水量与地下水位的年升降是息息相关的：平水年下降与回升趋于平衡，丰水年回升大于下降，枯水年下降大于回升。地下水位还可以达到多年平衡，即水位逐年下降，丰水年一次恢复。同时还发现，靠近渠道、坑塘等蓄水地方的机井，水位则不下降或下降不多，还原也快。这些情况说明，地下水和地上水是一个整体，是矛盾着的对立面，它们又统一又斗争，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因此，地下水位的下降和回升，是正常现象。那种一看到地下水位下降，就认为水源将要枯竭，不能再打井的悲观论调是没有根据的。地下水位逐年下降就是因为大量提取，连年干旱，自然渗透减少，



又没有及时进行人工补充造成的。因此，要合理开发地下水，就要对地下水不但有所取，还要有所补，以加速它的循环流动量。广大群众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利用河、沟、渠、库、坑和土壤蓄水进行自然渗漏，以及有计划地利用河道、灌溉弃水进行人工回灌，积极创造各种条件，改变地下水不足的情况，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形成干旱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这就决定了解决干旱的措施不能是单一的，必须是综合的。有了水，没有其它条件相配合还不行。毛主席说：“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要解决干旱问题，就必须正确认识并处理好水与土等各方面的关系。水和土是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群众说：“治水不改土，有水没用处；改土不治水，大旱要吃亏。”这是对水土辩证关系的总结。有了水，不搞土，土地不平，长期大水漫灌，不但浪费了水，而且会使土壤板结，产生盐碱，给农业生产造成损失。反之，搞了土，土地平整，水土配合好了，水就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有限的水量就可以浇更多的土地，少水相对地变成多水，小水能够大用。有些地方，即使一时没有水源，也可以从搞土入手，创造条件，促使矛盾转化。通过深翻改土，加厚活土层，就可以大大提高土壤的含水能力。据北方丘陵地区调查，当活土层加厚到八、九寸时，每亩地的含水量可以达到八万斤以上，形成一个看不见的“地下水库”，就能抗御一定程度的干旱。这个事实说明，在一定条件下，搞了土就等于搞了水。毛主席早就号召我们学一点土壤学，这对我们更好地掌握和运用水土关系的辩证法，取得发展农业生产的主动权，是有深远意义的。我们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水土的综合治理。有些地方，植被稀少，就要大搞植树造林，以林治水，以林固土；有些地方，土质瘠薄，就要大量增施有机肥料，以肥保土，以土保墒。因此，必须广泛发动群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努力改变生产条件，争取从根本上战胜干旱。

在抗旱的同时，还必须注意防涝。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遇旱有水，遇涝排水”的指示，高度概括了旱与涝、灌与排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我们抗旱防涝的根本指导思想。旱和涝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毛主席说：“一切过程都有始有终，一切过程都转化为它们的对立面。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是一种过程转化为他种过程的这种变动性则是绝对的。”旱和涝这两个对立面，也处在相互转化的过程中。从时间上看，一年之内可能出现先旱后涝、春旱秋涝，也可能连续几年出现旱或涝；从空间上看，这个地区旱，那个地区可能涝。这种旱中有涝，涝中



有旱，旱涝交错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但是，过去由于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一些地方，在旱涝频繁发生的情况下，却不能辩证地加以处置，往往是旱了就盼水，片面抗旱，忽视了旱后可能要涝；涝了又怕水，片面除涝，忽视了涝后可能要出现旱。如果遇旱兴灌弃排，遇涝兴排弃灌，时兴时废，那么，旱涝问题就会长期得不到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海河流域的人民在治理海河过程中，既考虑到防洪除涝，又考虑到蓄水灌溉。同时在一切实有条件的地方，积极发展井灌，不断提高抗旱能力，使农业生产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最近几年，河北省既有全省性的大旱，又有局部性的洪涝，但粮食产量仍然逐年提高。经验说明，防洪除涝的标准越高，抗旱灌溉的能力就越强。如果没有根治海河骨干和配套工程作基础，在河北就不可能大规模地搞平原蓄水；同样，抗旱工程越好，除涝能力也就越高，如果没有坑塘、沟渠等蓄水工程配套，骨干河道就不能在更大范围内发挥效益。因此，只有坚持抗旱除涝一起抓，才能使我们处于主动地位，立于不败之地。

抗旱除涝，是在广阔领域里同大自然作战，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长期斗争。这就需要对农田基本建设有一个长远的全面规划。有了长远规划，就有了奋斗目标，就能照顾到各个方面的特点及其互相关联，“使人们的眼光不被限制在眼前走出的一步”。因此，各级领导都要充分发动群众，统筹安排，作出农田基本建设长远的全面规划，并根据这个规划做出近期安排。这样，就会使广大群众和干部既知道自己搞什么，又知道全局怎么搞；既着眼于当前的建设，又看到了未来的前景，从而大大激发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在实施规划中，要特别注意当年施工，当年受益的问题。远和近也是相反相成的。远之所以远，就在于它综合了全局，指明了方向。由远想到近，能够鼓舞人心，提高抓好当年生产的积极性。近之所以近，就在于它解决了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由近看到远，为实现长远规划积蓄了物质力量，能够促进长远规划更快地实现。这样一步一步，一年一年，扎扎实实地搞下去，就能积小变为大变，使山河旧貌换新颜。

毛主席说：“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永远不会完结。实践的发展还会出现新的矛盾，提出新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以批林批孔为动力，广泛发动群众，掀起一个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高潮；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努力作战，继续前进。



学大寨就要抓路线

宁 江



今年，我们农业又获得了丰收。发展社会主义农业，根本问题是路线问题。许多事实说明，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的“农业学大寨”的号召，持久地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是推动我们在农业战线上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强大力量。

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为我们指明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方向和道路，鼓舞着我国亿万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努力奋斗。十年来，我们广西南宁地区的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广大干部、群众的路线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得到发扬，大寨道路越走越宽广，集体经济不断壮大，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农业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三年四年时间，全地区旱涝保收田的面积增加一百二十多万亩，粮食增产十二亿斤，等于过去二十年增产的总和，甘蔗、黄红麻、茶叶、水果的产量成倍增长。今年上半年，虽然遇到几十年未有的干旱和严重的霜冻、水灾，早造粮食仍然获得丰收，单产和总产都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晚造也获得大丰收。广大社员群众从这些变化中，更加看清了社会主义农业的灿烂前景，共同称赞这是坚持“农业学大寨”的丰硕成果，是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取得的胜利。

农业学大寨，归根结底是个路线问题。几年来的斗争实践，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大寨



之路。大寨，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建立以后，坚持继续革命，坚持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典范。学大寨，就要在农村中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抓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只要我们抓住农村的这个主要矛盾，并且抓住不放，一抓到底，认真解决农业发展的方向、道路问题，就抓住了农村工作的要点，抓住了学大寨的根本。

要真正把大寨的经验学到手，推得开，重要的是要不断提高干部、群众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南宁地区学大寨过程中出现的几次起伏，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文化大革命前，由于我们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觉悟不高，对刘少奇一伙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和干扰抵制不力，学大寨只学一些表面的东西，没有象大寨那样把主要精力放在狠抓两条道路斗争上，结果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多灾低产面貌长期不能改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受到了深刻的两条路线斗争教育，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比过去有所提高。一九七〇年，我们地区深入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抓紧农村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有力地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激发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夺得了农业生产的大丰收。但是，一九七一年上半年，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满足于已经取得的一些成绩，阶级斗争抓得不紧，阶级敌人就乘机破坏，煽动资本主义妖风，影响到早造粮食减了产。下半年我们汲取了教训，继续努力，粮食生产不但弥补了上半年的损失，而且取得了全年增产。一九七二年以来，随着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我们进一步提高了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抓住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反复进行批判，打击了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势力，出现了生产持续上升的局面。

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斗争都告诉我们，农业学大寨运动，既是一场向自然界进军的革命，又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我们要搞社会主义，阶级敌人要破坏，修正主义路线要干扰，资本主义倾向要捣乱，旧的习惯势力也会出来施加影响。对于这种情况，如果缺乏清醒的估计，就有可能离开党的基本路线所指引的轨道，偏离农业学大寨的正确方向。

在学大寨运动中，提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就要求我们必须紧紧围绕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根本问题，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



本主义。绝不能认为经过文化大革命，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农村中的两条道路斗争就不存在了。事实不是这样。从我们地区的情况看，当前农村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是激烈的：一方面有些批判过的错误的东西又有抬头；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倾向也常常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斗争突出表现在集体经济内部，按照什么路线、方针和政策办事的问题上。比如，在经营方针上，是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还是重副轻农；在种植计划上，是坚持在国家生产计划指导下实行因地、因时制宜的原则，还是搞无计划的自由种植；在产品销售上，是执行国家统购统销政策，还是通过各种形式把集体产品拿到自由市场上出售；在收益分配上，是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还是分光吃光，不留积累，甚至贪污盗窃、挪用公款、挥霍浪费集体财物，如此等等。对这些问题如果认识不清，处理不好，势必导致资本主义泛滥，瓦解和削弱集体经济。

对于两条道路斗争中的这些问题，我们只有用党的基本路线来观察和分析，才能认识它的本质。应该看到，由于农村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由于工农联盟的巩固，由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阶级敌人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不得不改变手法。他们惯用的手段，就是打着“发展集体经济”的招牌，以关心群众的利益为借口，想诱使某些基层干部脱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轨道，违背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从而扭转农业学大寨的方向，从内部搞垮集体经济。认识两条道路斗争不断发展变化的这种特点，很有必要。不然，口头上也讲党的基本路线，实际上往往抓不住现实的阶级斗争中的主要问题。有一个县就有过这样的教训。他们在学大寨运动中，对本县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动向缺乏深入的研究，特别是没有真正做到用党的基本路线去观察分析集体经济内部两条道路的斗争，一度有许多生产队以集体名义外出搞副业的资本主义倾向严重，致使农田耕作粗放，粮食减产。后来，县委提高了认识，放手发动群众，及时刹住这股歪风，把劳动力集中到农业生产上来，才改变了这种情况。这件事情使我们认识到，抓好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不容易的，需要我们反复提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需要深入到实际中去，精心研究现实的阶级斗争的状况，才能看得准，抓得牢，掌握同资本主义斗争的主动权。



抓好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应当看到，由于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人民内部也会经常出现某些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对这种思想要敢于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但是，不能用对敌斗争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必须把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严格区别开来。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复辟活动，必须予以坚决地揭露和打击。对人民内部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个教育问题。要坚持进行思想教育，运用总结经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着重提高阶级觉悟和路线觉悟。在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在全区农村广泛开展了新旧社会对比、执行正确路线与执行错误路线的对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对比活动。这样，进一步“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宣传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的危害，从而使党的基本路线深入人心。同时，还注意了结合当地实际，帮助群众从路线上分清那些是党的政策所许可做的，那些是不许可做的，更加明确前进的方向。

农村中两条道路斗争，不仅表现在生产领域和经济领域，而且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各个方面。我们要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不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不行。它对生产发展的关系不是不大，而是很直接、很重要的。农村中的“四旧”，是深入学大寨，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一个严重障碍。过去我们也讲要反对“四旧”，但总是认为同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关系不那么直接。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大大地提高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它是农村中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所谓“四旧”，就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孔孟之道一类黑货，都是为“克己复礼”，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我们学大寨，就是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群众，为革命种田，为人类多作贡献，“四旧”则鼓吹“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等地主资产阶级哲学，企图诱使人们放弃农业劳动外出搞副业，捞“横财”。我们学大寨，要坚持阶级观点，“四旧”就贩卖“同姓共族一家亲，打断骨头连着筋”等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妄图模糊人们的阶级斗争观念。我们学大寨，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搞农业机械化，而“四旧”则宣扬什么“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等天命论，妄图阻挠改变农业生产条件。这些情况告诉我们，对“四旧”的破坏作用，不能低估。在



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把批判农村“四旧”提到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和学大寨紧密结合起来，深入批判林彪、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继续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提高了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为革命种田蔚然成风，革命和生产都出现了新气象。

农村各级领导干部是学大寨的指挥员，他们的路线觉悟高低，对于学大寨运动的健康发展，关系很大。我们的干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情况是好的。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个继续提高基本路线觉悟的问题。有一些干部在通常情况下，可以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但是，在斗争比较复杂的情况下，有时就分不清是非，划不清界限。例如，对集体经济内部出现的资本主义倾向，就往往搞不清它的性质，看不到它的危害，甚至错误地认为是群众的要求，不敢抵制，不敢批判。同时，小农经济的思想还经常影响着一些基层干部，当集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他们就容易产生停顿下来的思想，缺乏办社会主义大农业的远大理想和魄力。这种状况，从根本上来讲，就是由于对党的基本路线理解不深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所造成的。我们地区从批林整风运动以来，把提高干部的基本路线觉悟当作学大寨的经常性的任务来抓。地、县分批轮训社、队干部，使社、队的主要干部每年都有机会到地、县学习一至二次。此外，全地区每年都抽调五千多名地、县、社机关干部深入到基层，具体地帮助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领导班子认真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联系总结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的经验教训，使他们在提高理论水平的基础上，从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比较中鉴别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从切身体会中提高路线觉悟。

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还必须认真组织贫下中农队伍，切实解决农村工作中的依靠力量问题。广大贫下中农是党在农村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坚定不移地依靠贫下中农，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政策才能在农村得到贯彻落实。但是，有一种错误的思想，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集体经济已经建立，贫下中农已经当家作主，再强调依靠贫下中农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意思就是说，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过时了。这种“阶级路线过时论”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表现。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明确指出：“依靠贫农、下中农，是党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以前，我们要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要发展农业生产，不依靠他们，依靠谁呢？不依靠他们，怎么样能够有效地、巩固地团结中农呢？他们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在农村中的社会基础。”这个论断告诉我们，依靠贫下中农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需要长期实行的路线。我们始终要依靠贫下中农，是由贫下中农的阶级地位和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所决定的。在农村中，贫下中农对旧社会最痛恨，对新社会最热爱，他们是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经济的最积极的拥护者，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中的坚强支柱。只有依靠他们，才能顺利地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办好集体经济，打击阶级敌人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有效地巩固工农联盟，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一个基层。武鸣县凤林生产大队地坛生产队建立贫协小组前后的变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没有建立贫协小组以前，这个队的阶级敌人嚣张，资本主义泛滥，学大寨运动冷冷清清，大队分配的水利工程任务，三年完不成，粮食生产长期徘徊不前；一九七二年建立和健全了贫协小组，树立了贫下中农的优势，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被打了下去，资本主义妖风被顶住了，学大寨运动搞得热气腾腾，一年完成了过去三年没完成的水利任务，两年内粮食增产六成。

几年来，我们在全地区范围内，对贫下中农队伍进行了全面整顿，由下而上地建立和健全了贫下中农协会（贫协小组）。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又特别注意加强对贫下中农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加强贫协组织的活动，增强了贫下中农的阶级责任感，进一步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树立了贫下中农的优势，保证了农村基层政权真正掌握在贫下中农手里。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几年来，我们在实践中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只有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学大寨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深入发展。我们决心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继续总结经验，不断提高干部和群众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把学大寨运动推向更大的规模和更高的程度。

（本文作者系中共南宁地委工作人员）



科 学 史 研 究

对人体认识的两种世界观斗争

金 卫

随着人类的出现，也就揭开了人类对人体自身的认识史。在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充满着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人类对人体结构、功能的认识的发展史，就是唯物论不断战胜唯心论、辩证法不断战胜形而上学的历史。本文仅从几个方面对这一斗争作一些初步回顾，希望能对更深入和更系统地研究这个问题，起一些促进作用。

关于局部和整体的关系

远古，由于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对人体的认识是表浅的、笼统的。随着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的发展，在认识生、老、病、死这些自然现象，特别是在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对人体的认识才由表及里，逐步地发展起来。

对人体结构与功能的进一步认识，有赖于对人体的解剖分析。

我国现存最早的医书《内经》中说：“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十二经之多血少气，与其少血多气，与其皆多血气，与其皆少血气，皆有大数”，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解剖分析的重要性的认识人体结构、功能的可能性。公元十一、二世纪，我国已有了根据实物绘制的人体解剖图谱。但是由于儒家宣扬封建礼教，鼓吹“厚葬”、“祭祖”，散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等谬论，严重阻碍了我国解剖学的发展。十五世纪后半叶以来，欧洲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自然科学的研究。那时，对人体的研究也



象其他自然科学一样充满着尖锐的斗争。“自然科学把它的殉道者送上了火刑场和宗教裁判所的牢狱。”（《自然辩证法》）一五四三年，即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的同年，维萨里发表了《人体的构造》，向人体认识方面的教会权威挑战。他不顾宗教禁律，解剖尸体，用科学观察驳斥统治了一千多年之久的种种谬说，因而横遭打击，被迫离职，并曾被宗教裁判所判过死刑。一五五三年，“塞尔维特正要发现血液循环过程的时候，加尔文便烧死了他，而且还活活地把他烤了两个钟头”。（《自然辩证法》）十九世纪初，我国富有革新精神的医学家王清任，反对儒家认为解剖人体是大逆不道的封建礼教，通过对尸体进行直接观察，著成《医林改错》一书，改正了古书上对人体结构的一些错误说法。孔孟之徒对他大肆攻击，骂他“不仁”，是“狂徒”、“邪人”。这些历史说明，人类对自己身体认识的发展，也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进行的。在这个领域内，没有冲破反动阶级陈腐的传统见解的勇气，就不能前进一步。

十七世纪哈维应用实验方法完成了血液循环的发现，也遭到讽刺和攻击，但却为生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呼吸、消化、神经等器官、系统的分析研究也相继发展起来。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细胞学说的提出，是一个重大的发展，它证明了“一切有机体，除了最低级的以外，都是由细胞构成的”。（《反杜林论》）近年来有人估计，整个人体约由多达一百万亿的细胞组成。这许许多多的细胞构成了人体的各种组织、器官、系统。

细胞的发现使“机体产生、成长和构造的秘密被揭开了”，（《自然辩证法》）人们进而在细胞水平上对人体的结构与功能进行了许多有成效的研究，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矛盾。从人体各个器官、系统的发现到细胞的发现，人们的认识过程基本上是沿着从整体到局部的方向进行的。这种把人体分解为系统、器官、组织、细胞而对其结构和功能进行研究的方法，促进了近代对人体认识上的巨大进展。但是这种方法把人体内各个部分孤立起来，撇开整体、撇开身体内部总的联系去进行研究，就逐渐形成了人体认识上的形而上学局部观点。十八世纪意大利学者莫干尼把器官看成是独立的。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德国学者微耳和则进一步把完整的机体割裂开来，把人体说成是“细胞联邦”，声称细胞才是真正的个体，“具有所有生命的特征”，而且不服从整体的一般规律，“向往自由，向往自主”；他否认神经系统在人体内的主导地位，鼓吹每一个细胞都是中心，说：“在整个神经系统内决没有



一个部分可以算是真正的中心点，能够象政府机关那样，将各种命令颁布到四面八方”；他反对整体的统一性，直到死前四年（一八九八年）还坚持机体不外乎是细胞的总和，声称“唯有抛弃神话式的统一，把各个部分也就是细胞看作生命的原因，才能获得正确的解释”。

微耳和所处的时代，恰恰正是人们开始认识到人体内各器官、系统的相互联系及神经系统的主导地位的时代。当时有不少学者和微耳和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批判他的细胞病理学乃是“片面病理学”，批判他关于人体是独立细胞的联邦这套说法乃是“假原则”，用“严格地说并没有局部的疾病”的论点来驳斥微耳和“除局部疾病以外没有别的疾病”这种错误论断。恩格斯在当时就认为，微耳和的细胞病理学反映出自然科学家由于束缚在旧的形而上学的范畴之内，因而在解释本来是可以证明自然界中的辩证法的最新事实时，陷于束手无策。虽然微耳和等人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对医学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却不能作出正确的理论概括。他们对人体的总的观点，反而赶不上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古代学者。二千多年前，我国医学家在以法家为代表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的影响下，曾指出：“人生有形，不离阴阳”，认为阴阳二气的对立统一贯穿于人体整个生命活动的始终；并认为“五脏相通，移皆有次。五脏有病，则各传其所胜”，说明人体各个脏器在正常或病理情况下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还指出“喜怒不节，寒暑过度，生乃不固”，认识到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六淫（风、寒、暑、湿、燥、火）等在疾病发生上的意义，说明人的精神活动和生理活动之间、人的生命活动和外界环境之间都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观点，虽然对人体各个局部的认识没有达到科学的分析，但在总的联系上却比以微耳和为代表的形而上学局部观点正确得多。当然，后来董仲舒之流极力把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黑货塞进对人体的认识，在阴阳五行等学说中，掺入了儒家思想的糟粕。清除这些垃圾，是继承和发扬祖国医药学这一伟大宝库的光荣任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恩格斯在一八七五年根据当时自然科学的成就，对神经系统在机体整体统一中的作用作出了深刻的辩证概括：“神经系统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由于蠕虫的头节向后延伸），便占有整个身体，并且按照自己的需要来组成整个身体。”（《自然辩证法》）十九世纪末以来，对神经系统，特别是管理各种内脏活动的植物神经系统的研究，进一步阐明了人体内各种活动的神经调节。二十世纪以来，相继发现了由内分泌腺分泌的几十种激素，以及其他一些生理活性物质，从而发展



了体液调节的概念。全身布满了神经和血管，因此通过神经系统和体液系统就把各个器官、系统联系成为一个整体。现已确证下丘脑的神经细胞分泌多种激素控制着内分泌腺的活动，这就打破了神经调节和体液调节之间绝对分明的界限，确立了在神经系统主导作用下统一的“神经体液调节”。正是这种神经体液调节，实现了人体各器官、系统的相互联系，保证了人体的整体统一。

由于形而上学思想方法在很多自然科学工作者中的长期影响，由于资产阶级已走向没落、反动而极力支持形而上学世界观，以微耳和为代表的局部观点不但当时没有被击败，反而影响逐渐扩大，阻碍了人体科学和医学的发展。在西医临床工作中，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见局部、不见整体，只见疾病、不见病人，忽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防治疾病中的重要意义等等偏向，就是这种局部观点对医疗实践的恶劣影响。基础医学各科中，也是对局部的研究比较多，而对各系统、器官、组织和细胞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研究则很缺乏。即使在生物、人体研究的新领域中，形而上学局部论也还顽强地表现出来。例如，近二十年来，关于生物高分子（蛋白质、核酸等）的结构、功能的研究发展很快，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成就就是其中之一。这一新领域对人体科学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体的遗传、记忆、免疫等重要生命现象，人体内的新陈代谢过程，各种生理活动及其神经体液调节的机理等等，程度不同地在分子生物学的水平上从一个侧面得到了新的说明。这是对人体生命活动和病理过程的物质性和可知性的有力论证，是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新胜利。但是有人却恣意曲解这一成就，断言一切生命活动可以还原为分子的活动，生物学只是物理学和化学的一部分，从而否认事物的多样性。毛主席指出：“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据。”（《矛盾论》）否认不同事物具有不同的特殊本质，便无法解释事物由低级向高级的辩证发展过程，也不能理解整体中的局部同孤立的局部有何不同。在历史上，莫干尼把器官绝对化，微耳和把细胞绝对化，现代还原论者们则把分子绝对化，实质上乃是形而上学的局部论、机械论的一种新形式。无论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深入批判把局部的东西看成高于一切的形而上学的局部论，仍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战斗任务。搞中西医结合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便是从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等方面正确研究人体的整体和局部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要



防止否认局部的东西，把整体看成是脱离局部的，把生命活动看成是神秘的这种“活力论”倾向。公元前四世纪，亚里士多德就说什么生命活动乃是一种具有造物、成形作用的神秘的“活力”（即所谓“隐得来希”）的体现。此后，这种“活力论”的观点花样不断翻新，成为对生物、人体的认识中唯心主义观点的一个顽固堡垒。近年来，国际上也有人在各种幌子下，抹杀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和物质运动的一般规律，实际上乃是“活力论”的再现。修正主义搞什么“心灵学”，有些迷信活动也鼓吹这种东西，以欺骗和蒙蔽某些人。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能深刻地揭示整体与局部的辩证统一，既注意对机体整体活动规律的研究，又注意对局部的东西、直到生命活动的理化基础的研究，使我们对人体的认识沿着正确的道路不断发展。

关于平衡和运动的关系

人体的结构和功能非常复杂，外界环境也经常变动，机体如何能保持正常的生命活动，这是对认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祖国医学早就用“阴”、“阳”的对立统一来概括人体的各种结构和功能，并指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强调了人体各种生理机能的平衡和协调对于正常生命活动的进行是很重要的。十九世纪，法国生理学者伯尔纳提出：细胞直接生活于血液、组织液等“内环境”中，“内环境的稳定是自由和独立生命的首要条件”。二十世纪以后，许多学者对内环境稳定现象及其机理进行了研究，进一步提出了“内环境稳定”（“稳态”）的科学概念，加深了对人体各种功能保持相对稳定的认识。

诚然，人体内环境和生理功能的相对稳定是一个普遍现象。体温、血压、脉搏、血液酸度、血糖浓度等等，正常时都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偏离这一稳定水平的波动即由神经体液调节机构加以调整而恢复常态。否则，过高或过低都不能保持正常的生命活动，将引起疾病甚至死亡。但是，在人体内，究竟稳定、同一性是绝对的，还是变动、斗争性是绝对的？在如何理解机体的平衡、稳定现象上，尖锐地反映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伯尔纳说：“所有的生命机构，尽管多种多样，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保持内环境中生活条件的稳定”。虽然伯尔纳指出内环境稳定的重要性，促进了对生物和人体生命活动及其调节机理的研究，但他在理论概括上，离开机体“永无休止的运动”，单纯强调一切为了稳定，有很大



的片面性，导致了生物学和医学中形而上学的平衡论。也有一些人，在理论上根本不承认人体内的平衡、稳定现象及其重要意义，又从另一个极端陷入形而上学，因此也不能正确揭示人体的客观辩证法。反对这两种片面性，是正确认识人体和发展我国新医学的必要条件。

早在伯尔纳发表他的基本观点之前四年，恩格斯就曾写道：“**暂时的平衡状态的可能性，是物质分化的根本条件，因而也是生命的根本条件**”，“在活的机体中我们看到一切最小的部分和较大的器官的继续不断的运动，这种运动在正常的生活时期是以整个机体的持续平衡为其结果，然而又经常处在运动之中，这是运动和平衡的活的统一”，“一切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和暂时的”。（《自然辩证法》）这是对生物和人体功能活动的多么精辟的科学论断！现代科学所提供的大量事实充分证明，在人体内到处都是对立统一：物质的同化与异化，神经的兴奋与抑制，肌肉的收缩与舒张，血流的推力与阻力，体热的产生与发散，血液的凝固与抗凝固，微循环中的缩血管物质与舒血管物质，免疫反应中的抗原与抗体，激素之间的相互拮抗与相互制约，……没有一个器官没有一种过程不是“**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种物质变为另一种物质，一种能量转换为另一种能量，一种状态变化成另一种状态，无时无刻不在人体内广泛进行着。“**生命，蛋白体的存在方式，首先是在于：蛋白体在每一瞬间既是它自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反杜林论》）死亡是生命的重要因素。在人体内，到处都在新生，又不断在衰亡。不仅从一个受精卵发育成人，直到衰老、死亡的全过程中体现着生与死的矛盾，同一个人，每一瞬间也都处在不断的产生与衰亡之中。皮肤不断在生长，又不断在剥落；血球不断在生成，又不断在破坏；就是被认为不能再生的神经细胞，它的蛋白质等成分也是在不断更新。看起来是同一个人，实际上他的一生中，整个身体不知换了多少遍。任何平衡都是、也只能是矛盾运动的一种状态。整个身体的各个部分自始至终都处于不断的产生和消灭之中，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之中。这种运动通过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化两种形态表现出来，显示出人体及各个器官发展的阶段性。

对机体平衡、稳定现象的不同理解，在医疗实践上产生了极为不同的影响。片面强调平衡、稳定，导致了那种消极平衡、被动防御、偏重静养的医疗保健思想。从运动与平衡辩证统一的观点出发，人们认识到，运动对于人体比稳定、平衡更为根本，更为重要。坚强的斗争意志，革命的乐观情绪，紧张的工作学习，经常的体力劳动，积极的体育锻炼，符合于人体的辩证运动，无疑是增强体质、



预防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的重要保证。当然，如果完全否认人体内相对平衡、稳定的一面，也会忽视必要的保护、必要的休息、必要的调节，这也是片面的。如果我们正确地把握了运动和平衡的辩证关系，并对不同的人体情况作出不同的具体分析，一定可以促使我国医疗保健工作更好地为劳动人民服务。

关于精神活动和人脑的关系

在远古时代，原始人对人的精神活动和离奇的梦境迷惑不解，便以为在人的肉体中存在着不死的灵魂。这种原始的愚昧观念，为剥削阶级和宗教势力所利用，并加以鼓吹，使人的精神活动长期以来被神秘化。我国的进步思想家，很早就提出过关于精神活动的唯物主义观点。荀子指出“形具而神生”，说明人的精神活动依赖于人的身体；王充说：“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范缜也说：“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都驳斥了超自然的灵魂的存在。在精神与脑的关系上，《内经》中有“头者精明之府”等记载，李时珍进一步指出“脑为元神之府”，但对其具体认识还很不够。十七世纪笛卡尔根据刺激角膜经常引起眨眼这类事实，提出了“反射”的概念，但他并没有抛弃关于灵魂的谬说，而把人体说成是藏在人脑松果体中的“灵魂”所操纵的机器。这种二元论思想对人脑的研究有顽固的影响。直到二十世纪，英国生理学家谢灵顿，虽然对脑和神经系统生理学作过不少研究，但还公然认为我们根本没有把人的精神活动和生理过程联系起来的科学权利。近年来有些研究脑功能的学者，提出了一些貌似新鲜的说法，把精神看成是对脑的发信者，实质上还是古希腊希波克拉底“脑是信使”、“脑是意识的译员”这种二元论老调的重弹。更有甚者，有的神经学家还直言不讳地宣称：“人类有不死的灵魂，这个论点是我们西方文明的基本公理”，妄图把人类的精神活动永远置于科学研究之外，作为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最后一个避难所。

然而，这些谬论不可能阻止人们沿着唯物主义的正确道路揭开人类精神活动奥秘的胜利进军。十九世纪，由于比较广泛地采用切除或刺激动物脑部的某些部位等实验方法，配合临床观察和尸体解剖，对于脑的功能的科学认识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当时确定了人类大脑皮层语言中枢的定位，证明了人类的语言活动，有赖于大脑皮层某些特定区域的结构与功能的完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中枢的发现就从一个重要方面确立了精神活动和脑不可分割的联系。但是由于形而上学思想的束缚，有人却把人类复杂的精神活动孤立地定位于大脑皮层个别点，荒谬地声称某一点管“私有欲”，某一点管“宗教的自我”等等，进而导致“颅



相学”骗人术的出现，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他们不了解人脑是个加工厂，人的精神活动不仅同人脑不可分离，而且同社会实践不可分离。离开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就不可能正确揭示人脑的功能。

一八六三年谢切诺夫发表了《脑的反射》，指出没有外界对感官的刺激，即使是一瞬间的心理活动也是不可能发生的。虽然从辩证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来看，仅用古典的反射论来解释人脑的精神活动，既流于机械，也很不充分，但在当时能明确地提出大脑反射的观点，则是唯物主义地认识人脑功能的一个重要进展。《脑的反射》一书出版后，立即遭到沙皇反动政府的查禁，并经沙皇内务大臣批准对作者进行起诉。起诉书中称“谢切诺夫的著作解释了大脑的精神活动”，这种唯物主义的理论，“破坏了现实生活的社会道德基础”，“是一种莫大的危险”。此后，就把谢切诺夫列入沙皇特务机关的黑名单中，进行了长期的迫害。这就看出，腐朽没落的反动统治阶级对唯物主义观点，是多么恐惧，多么仇视。但是，对人脑的唯物主义认识是扑灭不了的。事实上，在谢切诺夫之前，一八四五年，英国神经学家莱科克就发表了《论脑的反射功能》一文，提出了人脑的活动也是反射这一观点。这说明自然科学的理论不是某个天才人物的什么特殊天赋的创造物，而是历史进程中业已成熟的东西的体现；也说明对于人脑的唯物主义科学认识是必定要发生并不断得到发展的。

二十世纪以来，研究大脑结构和功能的许多新方法、新领域的兴起和发展，进一步以丰富的科学资料论证了关于人脑功能的唯物主义观点。人们已经可以记录到在进行思维活动、随意运动时大脑发生的某些电变化；人们也逐步认识到某些化学物质在精神活动中的作用，以及一些药物对精神活动的影响。神经生理学的新发展表明，脑干网状结构对大脑皮层的传入冲动，在维持清醒意识上具有重要作用，而网状结构的活动又有赖于体内、外的刺激。这就证明，人的精神活动既不能离开人脑，也不能离开人体内、外部世界而独立存在。神经外科的发展，为直接研究人脑提供了新的可能。在手术治疗中，刺激脑的感觉区，可以引起感觉成分，但从未感到任何客体，这就说明，人的感觉并不象生理学唯心主义者弥勒所说的那样，是脑、神经固有的“特殊能量”，不反映客观世界；恰恰相反，人的感觉只能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刺激颞叶的一些部位，引起了患者对一些往事的回忆，这正好从一个侧面提供了人的精神活动是人脑功能的确凿证据。现代科学的发展充分证明了人的精神活动乃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人的正确认识则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能动地反映客观世界的



结果。

关于人体的结构、功能和社会实践的关系

人体的结构、功能与社会实践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围绕着这个问题，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十分激烈。

在人类的形成上，反动阶级及其代言人鼓吹上帝造人，否认人体乃是地球上物质发展的结果；在个体发展上，宣扬宿命论，否认人体的结构与功能在社会实践中能够不断得到发展；特别是在和人脑的结构、功能密切相关的知识与才能问题上，则极力鼓吹先验论、天才论、生理决定论、遗传决定论等种种唯心主义谬论，否认社会实践对人的知识与才能的决定作用。孔老二的什么“生而知之”，苏修御用学者的什么“天才的思维是天才大脑的功能”，叛徒、卖国贼林彪的什么“脑袋长得好”，都是为反动政治目的服务的谬论。现代人体科学的发展，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剥掉了这些骗人鬼话的层层画皮，证明了人体的结构与功能和社会实践密切联系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人体由生物进化而来。我国唐代法家刘禹锡就曾指出：“人，动物之尤者也”，万物“乘气而生，群分汇从，植类曰生，动类曰虫。倮虫之长，为智最大”，这表明已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人类（“倮虫之长”）是动物进化的最高产物。达尔文根据大量科学资料，得出了人类是由某种古猿变来的科学结论，从根本上摧毁了“上帝造人”的神话。但是，由于从纯生物学的观点看问题，达尔文没有能解决猿是怎样变成人的。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锐利武器，才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这一重大问题，揭示了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人体之所以能在地球上形成，本身就是社会劳动、社会实践的产物。由于劳动，才使猿的前肢变成了人的手。“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并且，“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自然辩证法》）类人猿的脑量，根据颅腔的容量计算，约三百五十至六百五十毫升，到北京猿人，平均脑量已增到一千零七十五毫升，而现代人的平均脑量则达一千四百毫升。大脑的内部结构也愈来愈复杂，而且鲜明地打上了劳动的烙印：猿猴大脑内管理前肢和后肢的皮层运动区大致相等，人类则由于手的分化和在劳动中手的活动极其频繁而复杂，人脑内管理手的皮层运动区就比足区大得多，精细得多。猿猴大脑内并没有语言中枢，大脑左右两半球在结构上是对称的，人类则由于语言的出现，相应地在大脑皮层出现了语言中枢（绝



大多数人定位在左侧半球),最近还证实人类两侧大脑半球的结构也因此成为不对称。现代科学充分证明了恩格斯的著名论断:**“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个体的结构、功能也决不是一成不变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实践改变着人体的结构和功能。肌肉愈用愈发达,感官愈练愈敏锐,在不同专业化的劳动岗位上,人的神经系统和各种器官的功能,由于经久不懈的锻炼,可以达到惊人的灵敏、精确的程度。正是熟能生巧,劳者多能!人体体质的强弱也是可以改变的。早在公元二世纪,我国名医华佗就认识到:劳动和体育锻炼可以使**“身体轻便而欲食”**、“谷气得销、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终不朽也。”他的弟子吴普按他创造的**“五禽戏”**的方法,坚持身体锻炼,在年龄很大时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耳目聪明,齿牙完坚”**。现代运动生理学的研究也证明:体育锻炼能给整个身体以全面而积极的影响。运动是健身的法宝。经常参加体力劳动和体育锻炼,可以使体质由弱变强,强而愈强。青少年处于长身体的时期,体育锻炼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强壮的身体不是**“保”**出来的,而是**“斗”**出来的。我国广大人民群众遵照毛主席关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教导,广泛地开展了群众性的体育运动,体质显著增强,发病率明显降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

人的知识和才能,则更为社会实践所决定。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类的认识史,包括各门科学的历史,都证实着这个真理。多年来,人们对于一些处于特定的与外界隔绝条件下的小儿的观察,对一些感觉功能有严重缺损的人的观察,以及对许多遗传因素极其一致的单卵双生儿的追踪观察,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知识与才能的形成与发展都取决于社会实践。二十世纪中对**“狼孩子”**的观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狼孩子”**被救回人类社会时,不但不会说话,只能象狼那样嚎叫,而且连直立走路都不会,只能象狼那样四足爬行。仅仅在他们回到人类社会,经过长期的培养训练,才能逐渐学会说话,学会人的生活。这充分说明,离开社会实践,根本就没有人的知识和才能可言。什么**“生而知之”**的**“天才”**、“天才的大脑”,完全是彻头彻尾的欺人之谈。**“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社会实践是人的知识才能唯一的、不竭的源泉。

人类在社会实践中不仅改造了客观世界,同时也改造了主观世界和人体自身。这个过程始终受着社会制度的深刻影响。革命人民充满信心,瞻望未来:在



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下，剥削阶级鄙视劳动、脱离实践的恶习将被彻底清除，劳动变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剥削制度彻底摧毁，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原则和无政府状态将在生产过程中完全消除，环境污染得到完全控制，整个大地将被改造得更加优美；由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失业、贫困现象完全克服，同时由于人民的创造性和智慧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为人民服务的科学技术高度发展，人们对疾病和早衰的征服中将取得越来越大的成果。当然，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也仍然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存在着先进和落后的斗争，存在着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人们仍将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实践中继续认识和改造自己，并在德、智、体诸方面达到前所未有的新水平。

* * *

人体是地球上物质发展的最高产物。对人体的结构和功能的整个认识史，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的许多新进展，有力地证明，辩证唯物主义是唯一能够指导我们正确认识人体的强大思想武器。但是，对于人体的认识并没有完结，也永远不会完结。在人体认识上的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同样没有完结，也永远不会完结。辩证唯物主义人体观的胜利，并没有也不可能使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销声匿迹，它们还一定要改头换面顽强地表现出来。随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日益腐朽没落，在人体科学领域内还出现了一些直接与反动政治目的相联系的谬论。例如，有人公然鼓吹人的阶级地位是为人的生物差别所决定；有人歪曲电子计算机和自动化这一重大成就，胡说什么机器比人更聪明，妄图否定劳动人民的历史作用；有人极力把生物、人体内环境稳定的生物学概念硬搬到人类社会，否认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否认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诸如此类，都是为剥削和压迫辩护、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动谬论，必须不断地加以揭露和批判。我们应该牢记列宁的教导：“为了坚持这个斗争，为了把它进行到底并取得完全胜利，自然科学家就应该做一个现代的唯物主义者，做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

对人体的正确认识，过去是在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中得到发展的，现在和将来也必定要、并且必定会在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只要我们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深入开展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就一定能在三大革命运动中不断发展对人体的认识，使这一认识更接近客观真理，并更有成效地运用到实践中去，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